明末西學東漸的未竟之聲——以李之藻《天學初函》的選書爲討論中心*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明末，以利瑪竇為主的一批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在皇室、官員及士紳之間，掀起一股新的西學風潮。當時，許多士大夫隨利瑪竇學習西方學識，甚而奉教。而被稱作「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便是從跟隨利瑪竇學習，進而得以融會衍繹、撰著述學的奉教文人。

李之藻除奮力學習外，其以一生心力編纂的《天學初函》可說是目前存世最早且完整的一部西學叢書。這部書收錄萬曆迄崇禎年間，以利瑪竇為主的一批傳教士與明代文人合作翻譯的西學著述，包括教義思想，及各種天文、曆算、水利等科學技術，是研究明末西學東漸的重要叢書。

然關於此書的研究及討論，過往集中內容考釋、版本流衍，或僅就書中收錄的單一書籍進行分析；而作者李之藻基於什麼樣的心情及考量編成《天學初函》，卻少有完整深入的論析。本文試圖透過明末文集、方志奏疏，並結合晚近的研究成果，析理李之藻個人學養，及其人際網絡，以此勾勒出他在選輯《天學初函》時的種種思量。

晚明西學傳入過程中，對士大夫而言，實為一股新的文化衝擊，然在面臨此種衝擊與轉變時，其應對及接受程度如何，極令人好奇。而隨著明清之際政權交替，此一中西文化交匯所呈現的激盪起伏，或可從《天學初函》在進入清初所面臨的沈潛宿命，有所體會。

關鍵詞：明代、天學初函、李之藻、西洋傳教士、文人交遊

---

* 本文初稿曾於「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年11月15-16日）上宣讀。承蒙評論人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的鼓勵及提供資料，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及其他與會學者的賜教。論文修改期間，又承蒙南加州大學張錯教授審閱論文，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鄭永昌及洪健榮先生提供寶貴意見；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學者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然若本文有任何錯誤，文責由本人自負。

前 言

十六、七世紀之交，明末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一方面標誌著大航海時代來臨，西方海洋國家勢力自西向東擴張下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卻又是西方宗教文化掀起重大變革過程中，天主教勢力爲突破困局所展開的求存對策。就中國史本身而言，明末耶穌會教士的東來，不僅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也對晚明的文化及學術帶來深遠影響。而透過西方宗教教義的傳入，以及西方科技知識的傳達，實開啓早期西方教士與中國信徒合作譯著西學的良好典範。

出生於義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萬曆十年（1582）抵達當時西方唯一的東方據點—澳門，自此展開長達將近三十年在華的傳教生涯。利瑪竇在華積極擴展教務與致力西學編譯工作，堪稱是耶穌會在華發展的重要奠基者，對明末學術思想與知識階層帶來新的轉變與契機。明末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中國士大夫之中，與徐光啓、楊廷筠並列爲三大柱石的李之藻（1565-1630），跟利瑪竇之間同樣建立起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最終受其感召而受洗入教。成爲教徒後的李之藻，矢志如一，結合同道教友，終其一生投入提倡天主教義與編譯西學的工作，使得晚明西學東漸的風潮得以登上高峰。晚近研究即指出，李之藻去世前所編刻的《天學初函》，可說是早期西學東漸的總結。[1]

有關李之藻生平及其著述研究，目前所知，早期有陳垣〈浙西李之藻傳〉以及方豪的《李之藻研究》外，晚近則以余施霖《李之藻《天學初函》之研究》數種爲主。[2] 由於李之藻個人存世資料相當欠缺，以致相關研究成果未見進一步突破。[3] 陳垣與方豪的研究主要是以李之藻個人生平爲主軸，採用傳記式書寫方法細緻描述李之藻對明末西學西教的貢獻；至於余施霖的研究則轉向以李之藻編刻的《天學初函》版本研究爲取向，無疑對考析李之藻方面提供另一新的視角。

---

1 羅冬陽，〈論明末清初西學的分期與特徵〉，頁29。

2 陳垣，〈浙西李之藻傳〉；方豪，《李之藻研究》；以及余施霖，《李之藻《天學初函》之研究》。

3 根據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章〈導言〉，分別介紹李之藻姓氏爵里、研究李之藻資料之缺乏、有關李之藻之漢文及西文資料，以及資料記載評述等。其中指出記載李之藻最早及最重要的西文資料，即為利瑪竇寄回羅馬耶穌會之報告。此一報告初為義大利文寫成，後由金尼閣增補，並譯成拉丁文，屢被再版，傳教士德禮賢編《利瑪竇全集》時，曾收錄其中，迄今較為常見的中文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至於漢文資料，則以（清）阮元《疇人傳》記錄為最早，其他像是在仁和縣志、杭州府志、山東通志等各地方志中，亦有李之藻資料，然稍略；近人研究則以陳垣，〈浙西李之藻傳〉及方豪自著，為早期研究李之藻資料之深入著述者。

然而，完成於崇禎二年（1629）的《天學初函》，是目前所知完整存世的一套彙輯晚明西方天主教思想與西洋科學技術的叢書。有關這套叢書的討論，作者李之藻是以什麼的心情？以及基於怎樣的考量下編成《天學初函》一書，以往的研究卻少有深入論析；其次，《天學初函》一書的形成與李之藻個人學養及其建構的人際網絡具有密切關連性，透過同教、同年、同鄉、師生等多重關係，期能勾勒出《天學初函》成書背後複雜的關連性。[4] 本文透過明末士人文集筆記、傳記碑銘、方志奏疏等，以及進一步結合晚近研究成果，試圖探索明末這一部總結中西文化學術交流的西學叢書。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三章。第一章首先從李之藻的家學、師友、個人志趣、才智以及對新事物的渴求等因素，分析李之藻編輯《天學初函》的契機；第二章試圖從李之藻交遊網絡的角度出發，論析李之藻《天學初函》所反映出李氏與當時傳教士和文人間所構築的人際關係；第三章以《天學初函》一書體例與內容的編排以及對刊譯西學書籍的取捨之間，了解李之藻選書背後的思維。

文末最後指出，在晚明西學傳入的過程上，對當時思想界帶來了新的轉變與希望，卻也帶來士大夫之間另一種文化衝擊與矛盾。此一中西文化交會所呈現的激盪局面，隨著明清之際政權交替，其跌宕起伏的歷程，也造成《天學初函》之後面臨沈潛的命運。當李之藻編刻《天學初函》之際，後續應擬刻二函、三函，看來是他打算在完成初函後，繼續彙整明末西學的重大計劃。但隨著李之藻去世，竟後繼無人推動晚明西學風潮，這部《天學初函》似乎成了李之藻的「未竟之聲」。

一、促成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的契機

雖然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西班牙耶穌會教士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1506-1552）、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i，1539-1606）、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等人便相繼來華傳教；然在利瑪竇眞正將西方學術傳入中國之前，晚明文人的學習與思考的範疇，多數仍固守著傳統仕途的路徑，以經義制舉之學爲終生圭臬。

4 黃一農教授也指出，透過奉教人士藉由師友、親戚或同年、同鄉、同志等關係，將可以確切了解到明末清初西學、西教的影響層面。見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168。

被稱作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出生於人文薈萃的浙江仁和。在接觸西學之前，曾經受業於日後成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吳道南，[5] 年少涉獵多集中經史。他撰述過《四書宗註》二十卷[6] 及《頖宮禮樂疏》十卷，[7] 前書以南宋朱熹所定四書爲之註解，書雖已不存，然可看出李之藻在經學教育上所受的訓練，及日積月累的紮實基礎；後書則屬史部政書類，內容記載兼考證古樂制及樂舞等相關儀式，顯露出他個人對禮制及樂理的多方興趣。

然而，因大量翻譯西學著述而名留青史的李之藻，幾乎所有研究者都對他首度接觸西學的時間，以及接觸西學之後的種種作爲，感到興趣。[8] 然則，接觸西學以前的李之藻，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包括成長背景、學習歷程，甚至因職務變動而牽連交錯的人際網絡，對於日後李之藻在接觸西學時之看法、態度，甚至人生方向的選擇都會有所影響，值得我們深入瞭解。不過或許緣於史闕有間，在相關研究論述中，極少有人針對此一部分加以討論，或僅疏略帶過。故而，本章嘗試就李之藻的家學淵源談起，進而分析其求學及就職期間所遇到的師友、同年、同僚對他的或影響，或幫助；甚至透過彼此間的詩文往來，以建構出李之藻的個人形象，對於瞭解李之藻日後在接觸西學圖書時所面臨的選擇及判斷上，有助於進一步的釐清。

---

5 關於李之藻問業於吳道南，見方豪，《李之藻研究》，頁4。而據筆者查考，發現吳道南乃李之藻萬曆22年（1594）浙江鄉試之主考官，為座師身份；在時間先後上，推測其先為李之藻座師，而後始成為業師。吳道南（1550-1623），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己丑（17年，1589）賜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恪。有《曙谷集》。

6 （明）李之藻，《四書宗註》20卷，書已不存，但見於「鄞縣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著錄，為方豪30年前在杭州時讀書所作札記。見方豪，《李之藻研究》，頁47。

7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10卷，列於「史部．政書類」。書中首列頖宮儀注，次名物器數，并圖繪禮器樂器，末卷附鄉飲酒禮及鄉射禮。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2，謂「明初之制，猶行射禮於頖宮，迨其中葉，此禮遂廢。……之藻稽古證今，考辨頗為賅悉。」此書撰著及刊刻時間雖然不詳，根據陳垣，〈浙西李之藻傳〉推測，此書成於萬曆42年（1614）以前，為之藻未受洗前一、兩年所著也，頁72。但筆者據臺灣各圖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等）現存藏《頖宮禮樂疏》版本判斷，書前序跋時間最晚遲至萬曆戊午（46年，1618），顯然是書刊刻時間應為萬曆46年，較陳垣推斷時間更晚。

8 關於李之藻首度接觸到西學的時間，為萬曆29年（1601）利瑪竇來京，李之藻與友人前往拜訪之時。這段記錄係出自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云：「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察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按辛丑即29年；另據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述李我存事，指出「神父們到達北京時，他正在工部擔任重要職務……當他看見利瑪竇神父製作的世界地圖時，就十分驚嘆自己工作的局限。」與李之藻自序正不謀而合，故自陳垣、方豪，以至近代學者皆以萬曆29年之際視為李之藻接觸西學之開端。

（一）家學與師友的影響

欲瞭解李之藻，首先從他的家庭背景及學習經歷談起。根據方豪先生四十年來的研究，指出李之藻的家庭資料甚闕，唯一引用資料便是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erez de Semedo 1585-1658）提過「李之藻出生於武官家庭」。然而，或許由於史闕之故，方豪先生並未深究，筆者認爲此仍待進一步考證。[9] 此外，其他關於李之藻的點點滴滴，則大多散落在各種傳記、奏疏、地方志、少數文集或個人著述，雖早期西方文獻亦有，但多半疏略。

確實，出生浙江省仁和縣的李之藻，其家族史料幾乎未見。僅見李光元因職責所在，爲擔任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的李之藻及其父撰寫二則誥命，分別爲〈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及〈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父〉。[10] 根據誥命內容，並無提及父名，遑論其兄弟叔伯；但從文中敘述可知，其父因李之藻之故而受封，其制曰：「君子之有令兒，享崇報者，厚德其常也。……爾封某官某，乃某官某之父。經史自娛，聖賢爲則，孝於嗣母，篤及本生。爲父冤而補郡功曹，卒營以免。選椽屬而銓司幕府，皆偉其能。所後既殂，遂棄弗就。好書好士，令子賴以成名。教嚴教寬，吏遵之有譽。」此處提到李之藻的父親，因爲其父（即李之藻祖父）受冤，故而補郡功曹官營救其父，以免其刑；其後又因父親過世而棄官不就。由於資料欠缺，僅知「郡功曹」指郡守佐吏，而無法確知究爲何郡，但此一職務應爲掌理文職之官吏，而非武職之官。然即使如此，李之藻父親孝行兼備，兼有經史之長；另在職務上，好書好士、知人善任，則是清楚可知的。李光元甚至把李之藻的成就，歸功於其父的教養有方，顯然十分認同李父在家庭教育上的嚴謹有守，而此種在操守上的堅持，自然影響到日後李之藻在面對事情的處理態度。

李之藻長於孝德詩禮之家，對他在經史之學的訓練及興趣培養上，奠定了良好基礎。而眞正引領李之藻，並在其進入官場體系後，調動職務，極具影響力的貴人，則應該是座師兼業師的吳道南。吳道南，字會甫，號曙谷，爲江西崇仁

9 見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章，指出李之藻籍浙江省杭州縣之仁和，明嘉靖44年（1565）生，曾德昭稱之藻出生於武官家庭，頁2。然據筆者翻閱曾德昭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書中主要提及李之藻（曾氏稱李我存Ligo Zun，或李良Leo）處為第2部，卻無提及任何關於李父出生於武官家庭之句。

10 見（明）李光元，《市南子》卷5。

人。萬曆十七年（1589）中進士第二，授爲編修，知經筵日講；到了萬曆甲午（二十二年，1594）時，神宗命翰林諸臣纂修國史，而吳道南領修負責《河渠志》；[11] 同年，奉命擔任浙江鄉試的主試官。就在此年，李之藻參加鄉試，錄取爲舉人。換言之，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的這一年，吳道南成爲李之藻的座師，開啓了兩人師生關係的第一步。

雖然自李之藻中舉人，至二十六年（1598）成進士期間，並無文獻直接證明他曾經問業於吳道南；然從李之藻進士及第之後，第一個職務爲任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12] 其後，到了萬曆三十年（1602），改任工部都水司郎中，陸續參與治河相關事務；到了三十四年（1606），更被派至山東張秋治河。由於這些職務都隸屬於工部，經手事務又與治河密切相關，因此可以推測李之藻職務上的調動，必然與吳道南纂修《河渠志》有密切關係。換言之，當時擔任翰林院編修的吳道南對自己學生李之藻工作職務的安排，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事實上，吳道南對李之藻的幫助，還不僅如此。萬曆四十一年（1613）吳道南得到首輔葉向高的推薦，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此一職務爲位居正二品之官銜；[13] 在此同年，李之藻亦改銜爲南京太僕寺少卿，爲正四品官。[14] 一般來說，太僕寺爲五寺之一，爲掌管軍馬廄牧、車輿等事務，這跟李之藻以往在工部底下擔任的職務性質大爲不同；再者，這個官銜可說是李之藻平生所任的最高職位，至少與昔日所任工部員外郎、工部分司、開州知州，或者日後的都水司郎中，多爲正從五、六品官職相較，此一官銜位居四品，至少高出一品，顯然當時剛升爲禮部尚書的吳道南對此事著力甚多。

不過，關於李之藻改銜太僕寺少卿之事，歷來研究者都不曾討論過箇中緣由。事實上，李之藻的升官，應是在吳道南的暗地推動下，加上當時擔任翰林院檢討徐光啓（1562-1633）大力推薦，在雙重幫助之下，始水到渠成。這是因爲，早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期間，徐光啓便曾經上疏給禮部，極力推薦李之

11 關於吳道南事蹟，《明史》217〈列傳〉105有「吳道南傳」；而吳道南修纂《河渠志》之相關研究，則可參見李小林，〈吳道南及其《國史河渠志》〉。

12 見嵇曾筠等監修，《浙江通志》卷139著錄；另，工部營繕司之職務內容，主要為掌管宮殿、寺廟等土木營造之事。

13 見冷東，《葉向高與明末政壇》，頁91。

14 根據《明史》志第50〈職官三〉：「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正德十一年，增設一人。」

藻赴京修曆。但不幸的是，也在這一年，李之藻遇父丁憂，必須辭官，守喪三年；待服喪期滿，即萬曆四十二年（甲寅，1614）方可復職回京。換言之，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李之藻仍在守喪期間，並無官職。此年卻「改銜南京太僕寺少卿」，既補官且升職，若非背後有人提拔，恐難以解釋升官之源由。極有可能是，因爲徐光啓欲推薦李之藻入京修曆，故特別爲其留意官場職缺，恰遇有太僕寺少卿缺，而職缺遞補又須經禮部尚書那關。因此在恩師及教友的協助下，李之藻得以於萬曆四十一年改銜南京太僕寺少卿；但因爲當年仍在守喪期間，故於四十二年才赴京補官。[15]

另外，從與李之藻同年登進士榜的友人陳邦瞻[16]所寫的一首〈送李我存年兄補官北上〉七言律詩，更可以看出當年李之藻補官之緣由。詩中先寫祝賀李之藻得以上京施展抱負，但字裏行間同時透露此事乃源自友朋協助。詩云：

> 杯酒重尋十載歡，征軺那復向長安，愁邊湖嶠昏煙合，夢裏蘆溝曉月寒。
>
> 龍氣久從霄漢滿，羊腸總入世途難，亦知邂逅朋簪在，看爾新彈貢禹冠。[17]

在此詩中，提到兩人相識十餘載，飲酒相會爲送別；接下來以「龍氣久從霄漢滿，羊腸總入世途難，」或有表明自己，或言之藻未能得到皇帝賞識，而有難於上青天之感慨；並羨慕李之藻因「邂逅朋簪」之故，得以「新彈貢禹冠」。這裏的「新彈貢禹冠」，語出《漢書》典故，指貢禹與王吉兩人交好，後因友人王吉當官而同沾共喜；至於前句「朋簪」二字，則明確指出李之藻是在友朋的幫助下而補官的。這裏所言的友人，應即爲推薦李之藻入京修曆的徐光啓。

業師吳道南對李之藻的影響，除了職務上的提攜與幫助外，在品行學養的自我要求上，無形中也對李之藻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據載吳道南性剛毅不苟，究心理學。居官任事，明達政體，輔大政不爲詭隨。爲人則藏才於德，對人一視同

15 根據天啟癸亥（3年，1623）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云：「余以甲寅赴補，幸獲覲焉。」，甲寅即42年，可知之藻是萬曆42年始赴京補官。

16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明萬曆戊戌（26年，1598）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為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史。改補河南，建滍陽書院，集諸生講習。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終兵部左侍郎。

17 （明）陳邦瞻，《陳氏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卷19。

仁。歷官三十年，家產還不及中等之家。[18] 種種行事作風，可以說是提供李之藻一個良好的學習典範。而業師吳道南的豐富學養與政治經歷，對李之藻前半生實影響深遠，卻少有人注意到此點。

（二）才智志趣引發對新事物的渴求

三十歲以前的李之藻，除了出生地及生卒時間之外，並無其他記載。其後因爲中舉、會魁，陸續接觸科舉赴考的同年、職場同儕後，彼此間有了詩文往來，李之藻爲人處事的點點滴滴，才逐漸地清晰起來。像是慈谿錢文薦，他與李之藻不僅是浙江同鄉，而且同年中舉，彼此認識極深，私交甚篤。這一點，從錢文薦寫給李之藻的〈送南河郎中李振之年兄還朝序〉中，可以略知一二。序云：

> 善哉乎！浮淮客問也，答之者為吾年友李振之。振之靈心獨朗，妙術旁通，嘗學數于西域異人，讀其書如蝌蚪，而前鞮譯而外杳，不知其為何語，而振之已炯炯洞照。[19]

文中稱讚李振之（之藻）「靈心獨朗，妙術旁通」，一方面肯定他的聰明才智；另一方面說他「嘗學數于西域異人，讀其書如蝌蚪」，顯然錢氏對傳教士傳來的文字及數理之學，視之爲異邦人的異端學問，甚至「不知其爲何語」；但李振之卻了然於胸，且樂在其中，此點是錢氏學不來的，也因此佩服不已。

除了錢文薦之外，李之藻教友徐光啓也曾經稱讚道：「余友李水部振之，卓犖通人。」[20] 另，根據楊廷筠記載他自己與利瑪竇的一段對話，可以看出李之藻的才智聰慧，是高於他人之上的：

> 往予晤西泰利公京邸，與譚名理累日，頗稱金蘭。獨至幾何、圜弦諸論，便不能解。公歎曰：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21]

楊廷筠與李之藻、徐光啓並列爲「天主教三大柱石」，三人爲相知甚深的好友兼教友。其中，楊廷筠更因李之藻的緣故，而受洗於傳教士金尼閣（Nicolaus

18 參清雍正7年重刊《撫州府志》卷19〈人物考・名臣〉「吳道南」條下。

19 （明）錢文薦，《麗矚樓集十二卷》卷9。

20 （明）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天學初函》器編《同文算指》，明崇禎2年刊本。

21 （明）李之藻，《天學初函》器編《同文算指》卷前有楊廷筠〈同文算指通編序〉。

Trigault，1577-1628）、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60-1640）。[22] 至於利瑪竇，其來華傳教近三十年之久，接觸的人不知凡幾，可謂遍及朝野官員及士人群，然卻獨獨稱讚李之藻與徐光啓二人。利瑪竇以身爲一個老師的角度下了這個評語，可以證明李之藻在數理計算上所需的邏輯推論及空間概念，較之其他學生更爲特出。而這種與生具來的天賦，在他尚未接觸西學之前，便已顯露出來了。

年輕時的李之藻，對於空間概念的敏銳度，充分表現在他的個人志趣上。根據金尼閣整理利瑪竇回憶錄之記載，這位學識淵博的傳教士在提到初次見到李之藻時，對他觀看牆上懸掛世界地圖時的態度，特別感到驚異。他說：

> 他青年時雄心勃勃要對整個中國作一番很好的描述，並繪製十五省的精確地圖，這對他就意味著全世界。當他看見利瑪竇神父製作的世界地圖時，就十分驚嘆自己工作的侷限。他知識純誠，從地圖中得到良好的啟發，儘管對真理的理解還不充分。於是他馬上跟利瑪竇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為的是學習地理，他把公餘的時間都用來鑽研它。[23]

雖然李之藻所繪地圖今已不存，然從這段記載看來，李之藻有三個很重要的特質，值得我們留意：首先，年少的他，已嘗試繪製十五省的中國地圖，顯示出他早年對地理學素有志趣，這點還可以從利瑪竇自序《坤輿萬國全圖》提到李之藻，說他：「夙志輿地之學，自爲諸生，編輯有書」[24] 得到佐證。

其次，當時李之藻所繪的地圖，對於空間及地域概念的認識與理解，受到元、明以來傳統地圖繪製法的影響深遠。此據李之藻日後重刻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并撰序，序中首段指出：

> 輿地舊無善版，近《廣輿圖》之刻，本唐賈南皮（筆者按：即賈耽）畫寸分里之法，稍以縝密。然取《統志》、《省法》諸書詳為校詁，所載四履遠近亦複有漏。緣夫撰述之家，非憑紀載，即訪輶軒。然紀載止備沿革，不詳形勝之全；輶軒路出紆回，非合應弦之步，是以難也。《禹貢》之內且然，何況絕域。[25]

---

22 （明）楊廷筠，字仲堅，號淇園。本信佛，亦禮重僧人。在萬曆30年結識利瑪竇；到了萬曆39年，李之藻父親過世，楊廷筠前往弔唁，結識傳教士金尼閣、郭居靜等人。

23 參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頁432。

24 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自序，引自洪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又可見於存萃學社編集，由周康燮主編，《利瑪竇研究論集》，頁83。

25 參（明）李之藻，〈坤輿萬國全圖序〉，李天綱編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啟、李之

《廣輿圖》爲明嘉靖二十年（1541）羅洪先根據元代朱思本所繪的《輿地圖》增訂改進而來，爲當時地理製圖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地圖集。[26] 朱思本《輿地圖》的製圖方法，採用傳統「計里畫方」法（筆者按：即序中所言「畫寸分里」之法），以縱橫線成方格，每一方格長度代表里程，以此爲比例尺之用；至於製圖，則是先繪許多各地小幅地圖，最後再拼貼合成一幅大圖。[27] 這種「計里畫方」的網格繪圖方法，自晉代裴秀、唐代賈耽、元代朱思本以來，一直影響到明代著名的地理學家羅洪先，及其他地圖繪製者。而李之藻序中既言羅洪先《廣輿圖》較賈耽以來所繪諸圖更爲縝密，可見李之藻在尚未結識利瑪竇前所繪製的十五省地圖，亦是依照羅洪先等習用的傳統「計里畫方」法來繪製地圖。[28]

最後，李之藻最重要的特質，還是在於當他接觸新事物時會以科學驗證的態度來決定接受與否，並非盲目地全盤接受。當他首度見到利瑪竇那幅掛圖時，顯得特別留意與好奇，他曾將這段過程詳細敘述：「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筆者按：通「僚」字）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因爲余說：地以小圓處天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余依法測驗，良然。迺悟唐人畫方分里，其術尚疏，遂爲譯以華文，刻爲《萬國圖》屏風。」[29] 李之藻看到西方以經緯度線繪製的這幅大地全圖時，不僅究之甚詳，且實地證驗，至此完全顛覆他對傳統繪圖以「計里畫方」（筆者按：即李之藻所言「畫方分里」）之必然。

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頁147。

26 （明）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出生於武官家庭，其父羅循，歷兵部武選郎中。幼讀王守仁《傳習錄》，後拜李中為師。嘉靖8年（1529）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18年（1539）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史》列傳第171〈儒林二・羅洪先傳〉說他：「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羅洪先除了喜考圖觀史之外，還至各地考察，偶得元人朱思本地圖，遂以朱思本圖做為繪製新圖的藍本。在嘉靖20年前後，完成內含地圖45幅，附圖68幅，總計113幅的《廣輿圖》二卷。

27 （元）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號貞一，江西臨川人。自幼喜遊歷，並藉閱讀大量古地圖、典籍、方志，立意繪製新圖。自至大4年（1311）至延祐7年（1320），近10年期間，編成《輿地圖》2卷。所謂的「計里畫方」，係根據西晉宰相裴秀所創「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從率數計里」將地圖按比例縮小尺寸畫出格線的繪圖法。參周建平、葉新建，〈論羅洪先《廣輿圖》對朱思本《輿地圖》的繼承與發展〉。

28 此種「計里畫方」繪圖方式，為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徵之一。根據姜道章，〈論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徵〉指出傳統中國地圖學至少具有10種特徵，其中第2項的特徵便是「以計里畫方為基礎」。

29 明天啟3年（1623）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見《天學初函》理編《職方外紀》，明崇禎2年刻本。

對李之藻而言，當他體認到原來所學並非絕對眞理時，他的思考也較一般文人來得靈活，故金尼閣形容他「十分驚嘆自己工作的侷限……馬上跟利瑪竇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爲的是學習地理。」[30] 其後，李之藻便跟隨利瑪竇學習重製這幅世界地圖，之後增補爲《坤輿萬國全圖》，並於萬曆三十年（1602）在北京刻印。[31] 是圖係李之藻依利瑪竇原圖鏤版，以「南北爲經，赤道爲緯，周天經緯捷作三百六十度而地應之」[32] 的概念製成，不僅運用了西方橢圓投影（Projection Ovale）及圓錐投影（Projection Conique）的繪製技術，[33] 同時採用以經緯度來測量地理定位，顯然此時的李之藻心裏頭已經接受西洋製圖學裏某些測繪方法。之後，經過李之藻演算與測量，認爲此種以經緯線定位、圓弧投影的測繪法，相較於中國傳統「計里畫方」的繪製方法，不僅誤差較小，也更爲準確。事實上，李之藻對於西方所傳來的新事物、新知識的接受度頗高，這不僅是源自於他個人對於追知求新的渴望；更重要的是，以透過實地驗證，達到尋求眞理的目標，正是一種追求科學精神的極致表現。

李之藻對於西方事物各種新知識的渴求，除了繪製地圖之外，還表現在對各種科學儀器的理解與製作上。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

> 李良（筆者按：即李之藻，受洗聖名中譯為「良」）也對數學的其他部門感到興趣，他全力以赴協助製作各種數學器具。他掌握了丁先生（Father Clavius）所寫的幾何學教科書的大部份內容，學會了使用星盤，並為自己使用而製作了一具，它運轉得極其精確。接著，他對兩門科學寫出了一份正確而清晰的闡述。他的數學圖形可以和任何歐洲所繪的相匹敵。[34]

30 參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頁432。

31 據考利瑪竇所繪製的世界地圖，前後計歷12次刻版（參洪煨蓮，〈考利瑪竇世界地圖〉），而由李之藻主持刻印的這幅世界地圖，為第3次刻版，定名為《坤輿萬國全圖》。此圖由大屏六幅組成，較以前第一次萬曆12年（1584）王泮於肇慶刻印的《山海輿地圖》，以及第二次於萬曆28年（1600）吳中明於南京刻刊《山海輿地全圖》圖版更大。全圖長約179公分，寬約380公分。參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頁71~76。

32 參李之藻，〈坤輿萬國全圖序〉，李天綱編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頁148。

33 關於利瑪竇所繪世界地圖採用西方地理製圖學的繪製方法，可參考林東陽，〈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頁313-336。

34 參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頁432~433。

這段敘述，在他自己撰述〈渾蓋通憲圖說自序〉中，對於接觸西方天文學，及製作天文儀器（星盤）的機緣與過程，則有更清楚的說明：

> 昔從京師識利先生，歐羅巴人也。示我平儀，其制約渾為之。刻畫重圜，上天下地，周羅星曜，背綰睨筩，貌則蓋天，而其度仍從渾出。……得未曾有，耳受手書，頗亦鏡其大凡。旋奉使閩之命，往返萬里，測驗無爽，不揣為之圖說。間亦出其鄙譾，會通一二，以尊中曆。[35]

此本《渾蓋通憲圖說》，乃是利瑪竇老師丁先生（Clavius）用拉丁文著述的天文學著作“Astrolabium”，而經由利瑪竇口授，李之藻整理成書。雖然後來有學者研究指出：此書經李之藻整理之後，從內容到體裁與原著多有相悖。[36] 然則，與其說是李之藻改變了原著論點，倒不如說他在經過多次閱讀理解、實驗證明後，認爲以傳統天圓地方的「渾蓋說」宇宙觀來詮譯西方傳入的「地圓說」理論，比較容易爲國人接受與吸收。[37] 其用意，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則是：「語質無文，要便初學。俾一覽而見天地之大意，或深究而資歷象之至理。」[38] 顯然這種詮譯方式，主要是爲方便初學者的理解與學習；至於幫助學習的最終目的，則還是用於曆法之上。

今日看來，在更爲精密的科學論證下，李之藻對天文與天體的詮譯，雖然顯得固守傳統，且不夠精細；但是在他接觸西方天文學說的過程中，並不以抗拒心態置之，而是透過實地製作及科學驗證的方式，來判斷接受與否。從李之藻的例子，或許可以說明晚明部分奉教文人在面對西方文明的入華時，並非盲目地全盤式接受，而是經過深入思考後的愼重選擇；正因如此，這些高度接受西學知識的文人們，方能體認此點，而堅持始終如一。

35 參（明）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自序〉，《天學初函》器編《渾蓋通憲圖說》，明崇禎2年刊本。

36 參趙建海，〈李之藻與《渾蓋通憲圖說》──比較天文學的地平〉，頁200。

37 關於李之藻以渾蓋理論來解釋利瑪竇地圖上呈現之地圓說觀點，可參見祝平一，〈跨文化知識傳播的個案研究──明末清初關於地圓說的爭議，1600-1800〉。

38 同註35。

二、李之藻的人際交遊際會成書因緣

被尊稱爲「天主教三柱石」的李之藻、楊廷筠[39]和徐光啓，[40]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歷來探討西學東傳的研究論述，絕不會遺漏三人在推動天主教義及西方科技上的努力與成就，然大多以析論其個別譯著，或各種與西學相關之主張及事件。有趣的是，近年來則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朝向以西學人士間的交遊與互動爲主軸，試圖釐清這批西學人士之間形成的交遊網絡，包括文人與傳教士之間、文人與文人之間的重疊往來，甚至探究私人情誼之間的親密離疏。[41]本章便欲從李之藻個人出發，藉由其建構出來的人際網絡，進一步探究他在學習西學過程中的想法與轉變。其中，筆者發現在李之藻的人際關係中，以幫助他跨入西方學術領域及人脈建立的傳教士利瑪竇；及另外兩位摯友楊廷筠、徐光啓，其交情不僅最爲親密，同時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三個人。故而，以李之藻與傳教士及晚明文人間的交遊網絡爲主要探索點，並輔以引發李之藻日後毅然朝向西學研究及譯著的修曆與購銃事件爲輔，是本章討論重點。

（一）以利瑪竇為主的西學人脈

萬曆二十九年（1601）一月，利瑪竇在接獲神宗旨意後，遂偕同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入京進貢。隨後數月間，李之藻因聽聞利氏入京，即急邀僚友拜會，後因驚異其於地理製圖學及曆算上的進步，不僅向利瑪竇學習繪製地圖，[42]更陸續與之合譯各種天文、數理演算之著述。於此同時，李之

39 關於楊廷筠生卒年，有二種說法，一說認為楊氏出生於明嘉靖36年（1557），主張此說為王重民、方豪等人；另一說則認為楊氏出生於嘉靖41年（1562），比利時籍傳教士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即主張此說法。本文採用第一種說法。楊廷筠（1557-1627），字仲堅，別號淇園、鄭圃居士、沁園居士，浙江杭州仁和縣人。萬曆7年（1579）中舉人，20年（192）成進士，歷任江西安福縣知縣、湖廣道御史、四川道掌道事、南直（江蘇）督學。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

40 （明）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萬曆25年（1597）舉鄉試第一，32年（1604）成進士。官由庶吉士歷贊善，歷任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

41 關於此種研究趨勢，大抵要從黃一農教授開始，其陸續發表數篇期刊論文中，像是〈從韓霖「鐸書」試探明末天主教在山西的發展〉、〈明末韓霖「鐸書」闕名前序小考──兼論歷史考據與人際網絡〉、〈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等，以及專書《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皆是以人際網絡為切入角度進行深入研究，開風氣之先，並帶動此一方面的研究風氣。

42 根據方豪，〈利瑪竇年譜〉記載：萬曆29年（1601）1月24日，利氏入北京；至6、7月開始鐫刻〈坤輿萬國全圖〉第3版；6月至12月，利氏與京中名公鉅卿相交甚深，其中有閣老、尚書、侍郎，及其他顯宦，而以馮應京、李之藻二人為最。參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1576-

藻亦透過利瑪竇的關係，結識更多與西學相關的人才。筆者認爲這些各種人才的聚集與協助，對於日後李之藻在編纂《天學初函》初步選書的考量上，極具相當關鍵的影響力。

李之藻剛開始接觸到新奇奧妙的世界地圖時，原本有意拉攏昔日同僚好友一同參與，像是爲《坤輿萬國全圖》撰寫跋文的泚陽陳民志，跋中提及李之藻與利氏的相識歷程，說道：「夫西泰子經行十萬里，越二十禩（筆者按：同「年」之意）而屬吾土，入長安。李繕部旦暮而過之，遇亦奇矣哉。」另，第三幅大屏下左方有蜀東楊景淳弁文，則提到他自己與李之藻的關係，及李之藻與利瑪竇的關係，其云：「不佞淳與振之氏，爲同舍郎，稱莫逆。而與西泰子傾蓋如故者，茲刻也，蓋同心云。」此話意謂兩人之間不僅是同僚，且爲莫逆之交；而後祈光宗題跋，則是自慚地說道：「余友李振之甫愛而傳之，乃復畫爲圖，烏能爲此。儻所謂通天、地、人者耶！余未爲聞道，獨于道之言嗜如餓渴，故不覺津津道之如此。如以余之敘茲圖也，而併以余爲知音，則余愧矣。」[43]

事實上，爲李之藻撰寫跋文的這三位友人，都是他在結識利瑪竇之前往來的同僚兼好友。其中，跋語雖未提及參訪利氏之事，然據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提到：「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筆者按：通「僚」字）友數輩訪之。」其中所稱「寮友數輩」，究竟爲誰，歷來並無明確的說法；因此，三人既題跋於李氏刻圖之上，則必有其淵源，大抵此三人即爲李之藻序中所稱「寮友數輩」。不過，三人雖因李之藻而結識利瑪竇，但或受限於傳統文化深植；或因個人才學侷限；或由於興趣欠缺等因素，最後並未眞正參與西學活動，而僅止於欽慕，這點相信李之藻後來也不再強求。

其後，李之藻跟隨利瑪竇學習天文理論，陸續接觸其他傳教士及對西學有興趣的文人，交遊網絡自然而然偏向以西學人士爲主。對李之藻而言，最令他由衷欽佩，且影響最爲深遠的人，自然是亦師亦友的利瑪竇。而他與利瑪竇的關係，歷來研究論述多如繁星，此處不打算一一贅述，僅以李之藻看待利瑪竇的角度，說明利氏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李之藻爲利瑪竇《畸人十篇》撰序內

1577。顯然在利瑪竇入京數月之間，李之藻已結識利氏，並著手進行鐫刻地圖之事。

43 以上跋文參見張鋐，《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書前附《坤輿萬國全圖》原圖頁碼9；後兩段引文則參考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頁72。

容，我們可以看到李之藻眼中的利瑪竇形象：

>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沈沙狂颶，與夫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留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始不肖以為異人。已覩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囊究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44]

對於多數明人而言，利瑪竇是一個酬應頗繁的畸（奇）人，而利氏也以此自嘲；但對於跟隨利氏將近十年的李之藻而言，其上知天文、下明地理，精及性命、象緯，旁及句股算術，是個博聞且有道術之人。這點不僅讓李之藻深深折服，亦激起他向利瑪竇研習西學的渴求與慾望。除了前述提到的《坤輿萬國全圖》之外，兩人還合譯了許多西學圖書，像是《經天該》、《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圜容較義》等等。

不僅如此，李之藻接著又說：「迄今近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間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45] 此「至人」一詞，語出《莊子．逍遙遊》：「至人無己」，稱人以至高至上，是極爲推崇的讚語。而李之藻既以「至人」稱利瑪竇，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利瑪竇的學識及人品已達中國哲人的最高境界；而利瑪竇亦師亦友的態度同樣也顛覆傳統中國師道尊卑的對待方式，讓李之藻有另一種新的體會。

基於內心對利瑪竇的崇敬與感佩，加上萬曆三十八年（1610）突然患病京師的變故，李之藻在病危之際，對利瑪竇朝夕細心看顧深受感動，毅然受洗，而皈依天主。[46] 自此之後，李之藻成爲極爲虔誠的天主教徒，除維持原先實用實學、俾利民生而研習西學的想法外，還增加傳達與推廣教義的熱切信念。其不僅在行爲與心態上幡然轉變，亦較以往更爲看重以利瑪竇爲主的傳教士們所傳入之西方

44 《畸人十篇》，書成於萬曆36年（1608），利瑪竇撰，李之藻為之刻印并作序。根據內容，此書為利瑪竇與10個明代儒士談哲論道的談話記錄，根據羅光，《利瑪竇傳》及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整理，此10人包括李戴、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左海、龔大參，及不知名的郭某、某富人，而李之藻亦為談哲論道的其中一人。此序出於李之藻之手，參（明）李之藻，〈刻畸人十篇〉，見《天學初函》理編《畸人十篇》，明崇禎2年刊本。

45 同前註。

46 參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收入鍾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

教義及科學技術，筆者認爲此應是促成日後李之藻欲彙編第一部西學叢書《天學初函》的重大契因，而利瑪竇便是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此外，在李之藻繪製地圖，並跟隨利瑪竇研習西學期間，透過利瑪竇的關係，李之藻亦結識許多新朋友，尤其是那群跟隨利瑪竇一同赴京的傳教士們。像是爲利瑪竇自澳門帶來自鳴鐘、聖母像、萬國圖誌等貢物的義大利籍傳教士郭居靜、[47] 隨郭居靜帶回貢物，並跟著利瑪竇同去拜謁萬曆皇帝的西班牙籍傳教士龐迪我、[48] 與教友楊廷筠合撰《職方外紀》的義大利籍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自羅馬攜來七千部西書的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葡萄牙籍傳教士傅汎（一作泛）際（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49] 擔任中國耶穌會會長的義大利籍傳教士龍華（一作化）民（Nicolaus Longobardi，1565-1655）、製作簡平儀器予利瑪竇，且口授徐光啓《泰西水法》的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等。李之藻在結識這批傳教士之後，開始接觸到天主教義及不同類型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則是開拓了李之藻的新視野，從此改變他對世界的想像與觀感。

隨利瑪竇入華的這批西洋傳教士們，其中有幾個人對李之藻的幫助，是特別值得我們提出說明的。除了利瑪竇兼具業師、教友的雙重身份外，其分別在教義及學術方面的影響皆十分深遠，此點是無庸置疑的；至於其他的傳教士，則按其參與事情之深淺比重，從教義及學術二種面向加以說明。教義方面，除了利瑪竇之外，便以義大利籍傳教士郭居靜出力最多，影響亦最深遠。郭居靜最早是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應徐光啓之邀至上海開教；稍後，李之藻透過利瑪竇的介紹，結識郭居靜及金尼閣兩位傳教士。萬曆三十九年（1611）時，之藻遇父丁憂告歸，遂敦請郭居靜、金尼閣兩位傳教士并鐘鳴仁修士至浙江杭州開講，並租屋建教堂；同年，好友楊廷筠因前往杭州弔唁李父，因而結識郭、金二先生。楊氏其後更在李之藻的勸說下，請二人爲其受洗。[50] 換言之，李之藻所以成爲天主教

47 參羅光，《利瑪竇傳》，頁105。

48 參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萬曆29年）三月中浣，禮部採取行動，傳利子來見。……進館（禮部禮賓館）後第三日，利子偕龐迪我隨從其他入貢外國人員，進宮參拜御座」，頁30。

49 根據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方豪六十自定稿》。

50 根據晉江・丁志麟著，《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云：「先是西泰利瑪竇先生，來賓于廷，倡明天主之道，公（楊廷筠）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實先從事焉。歲辛亥（1611）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過郭仰鳳（即郭居靜）、金四表（即金尼閣）交善，

徒，淵源於利瑪竇，因此對利子推崇備至；而在利瑪竇逝世之後，則得力於郭居靜等傳教士最多。郭居靜在李之藻等人邀請之下，透過宣講教義以傳達天主宗旨，幫助李之藻身爲教徒達成其欲盡傳教心力的期望，可見在傳達天主教義及協助李之藻傳教方面，郭居靜實不餘遺力。

至於學術方面，繼利瑪竇之後，李之藻與葡萄牙籍傳教士傅汎際交情則最爲深切，在學術上的合作亦最多。兩人合作譯著的西學論述有《寰有詮》及《名理探》二書，係爲翻譯自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提出的宇宙論及邏輯學之書，原爲葡萄牙高因盤利耶穌會學院（University Coimbra）授課教材。[51] 自天啓三年（1623），李之藻退居杭州時，便與傅汎際在靈隱、天竺附近西湖邊築廬屋，同時著手翻譯《寰有詮》，於天啓五年（1625）譯畢，然至崇禎元年（1628）始成書刻印。[52] 根據李之藻是書序中指出：

> 余自癸亥（筆者按：即天啟三年）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泛（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為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翻譯，誠不忍吾當世失之。[53]

李之藻自述翻譯此書，多遇艱澀難解，然卻能苦中作樂，每舉一義，便以心眼爲開樂在其中，此乃眞正的學問之道。至於《名理探》，是在《寰有詮》譯著完成後，才開始著手進行。是書由傅汎際釋義，李之藻達辭，自天啓七年（1627）開始譯述，兩人合譯了十餘卷。然而，崇禎二年（1629）時，李之藻因奉命入京修曆而離杭北上，兩人不得不中止譯著此書，傅汎際亦離杭赴陝西；隔年，李之藻便因病而卒，此書後續由傅汎際請人續譯。直至崇禎四年（1631）首五卷才在杭州出版，但李之藻已無緣得見。[54] 然仔細數來，李之藻與傅汎際合作譯著西書的

比告歸，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適乃尊疾篤時，因即以終傳之事重托之。公聞李封君歿，往唁，見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轉引自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頁166。

51 此書為葡萄牙高因盤利耶穌會學院之授課教材，其中「高因盤利」乃據李天綱譯名（見〈譯《寰有詮》序〉，《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頁168）。另，方豪譯為高因勃拉大學，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頁209。

52 據方豪按李之藻之子次彪為《名理探》序文內容提到其父：「迨癸亥盧居靈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寰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繙是編。」推測該書為2年後之天啟5年（1625）譯畢，而後隔了1年，至天啟7年（1627）才開始翻譯《名理探》。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頁213。

53 參李天綱編注〈譯《寰有詮》序〉，《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頁168。

54 參方豪，〈名理探譯刻卷數考〉，《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1884-1886。

時間，自天啓三年（1623）迄崇禎二年（1629），時間長達七年，兩人之間在學術上的研討情誼，可謂深厚之至。只可惜《寰有詮》一書完成時間過晚，刻印時間又遲至崇禎初年；而《名理探》則是譯書未竟，或許間接造成李之藻在崇禎二年（1629）刻印《天學初函》未及收入的主要原因。

至於西班牙籍龐迪我、義大利籍艾儒略、熊三拔、比利時籍金尼閣等其他傳教士，雖然與李之藻亦有教義或學術上互爲切磋交流的關係，但多半是討論交談觀點，而非合譯關係，在情誼上自然不如傅汎際來得密切深入。像是龐迪我，萬曆二十四年（1596）隨龍華民搭船東來；後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隨利瑪竇入京晉見神宗。推測李之藻前往拜會利瑪竇時，應與龐迪我等人有過見面之緣。然衆人較爲密集接觸的時間，則是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逝世前後之間。萬曆三十九年（1611），由於徐光啓、周子愚等人推薦龐迪我、熊三拔入京修曆，並促李之藻入京協助，彼此有了進一步的交往；[55] 到了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李之藻上疏神宗，再次薦請龐迪我、龍化（華）民、熊三拔、陽瑪諾（Manuel Dias, Jr.，1574-1659）等入京翻譯西洋曆書，[56] 然未獲神宗同意。但顯然此時李之藻與龐迪我等傳教士已是多年熟識，亦深知學習曆算之學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而在利瑪竇逝世多年之後，李之藻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傳教士又因地圖繪製而展開討論。根據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云：「而是時利已即世，龐、熊二友留京，奉旨繙繹（筆者按：即今之「翻譯」）。龐附奏言地全形，凡五大州（筆者按：應爲「洲」），今缺其一，不可不補，乃先譯原幅以進，別又制屏八扇，載所聞見，附及土風物產，楷書貼說甚細。余以甲寅（筆者按：萬曆四十二年，1614）赴補，幸獲覩焉。」其後又提到「今年（筆者按：天啓三年，1623）夏，余友楊仲堅氏與西士艾子爲增輯焉。……而艾子之友金子則又曰：此姑以綴屏上之圖也云爾。」[57] 據此段內容，可看出李之藻將楊廷筠（字仲堅）定位爲摯友關係；而與龐迪我、熊三拔與艾子（艾儒略）之間，則應較一般傳教士的交往，情誼更爲深刻。其中尤以跟楊廷筠交善的龐迪我、艾儒略二人，往來密切；而與徐光啓有合譯關係的熊三拔，亦極相熟；然與金子（金尼閣）[58] 則較爲疏遠，大抵是視其

55 參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卷2。

56 參（明）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皇明經世文編》卷493《李我存集》。

57 參（明）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天學初函》理編《職方外紀》卷前序，明崇禎2年刻本。

58 關於金尼閣的學術品行，歷來學者認為爭議性頗大。在張鋪教授撰述《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

爲艾儒略之友人，彼此之間應無私交。換言之，對李之藻而言，因透過利瑪竇關係而認識的這批傳教士，確實在學術討論與交流之間累積了多年情誼，亦早已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然即使如此，在他的心目中，在交友親疏上，仍有等差層次之別，這也影響日後他在擇入《天學初函》書籍時，有其優先順序上的考量。

（二）堅若磐石的天主教三柱石

楊廷筠、徐光啓、李之藻並列爲「天主教三柱石」，不僅是因爲三人同樣受洗成爲虔誠教徒；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對天主教義、教徒及西方學術上的熱切維護與信念上的堅持。尤其在經歷過萬曆四十四年（1616）沈潅引發的南京教案之後，傳教士們先是見到徐光啓上疏爲西士陳辯；後又知楊廷筠及李之藻遇無可置身之西士，皆請至其家隱匿之事。[59] 當時在杭州避難的傳教士，其中便有郭居靜、金尼閣、畢方濟、龍華民、艾儒略等人。在此次教案中，西方傳教士們受傷頗重，不論南、北京都有教士被補殺害之事，然而徐光啓的在京上疏，而楊廷筠和李之藻的居家隱匿，其做法雖不同，但在心情上卻是相同的。而三人維護教義及幫助教徒的種種行徑，看在傳教士及天主教徒眼中，確實得到高度的認同與敬重。

然則，得到傳教士及教徒們敬重的三柱石，彼此之間交情卻非一時一地建立起來的，乃是在不同因緣際會下積累而成。以楊廷筠與李之藻而言，兩人初識的時間及地點並無資料可考。兩人同爲浙江仁和人，係爲同鄉，楊廷筠較李之藻年長八歲，在萬曆七年（1579）中舉人，二十年（1592）成進士，顯然較李之藻多了幾年在官場上打滾的經歷。之後，利瑪竇入京，楊廷筠亦前往拜會，會晤期間

竇入華及其他》，頁78，曾經針對金尼閣的學術作風加以論述，指出：「他（即金尼閣）一生最受爭議之處，即為他在1614年第一次自中國回羅馬，攜回利瑪竇遺著《中國傳教史》（或稱《中國札記》），並自意大利文翻譯成拉丁文，另加上他自己添寫利氏病逝、殯葬的兩章，於次年（1615）逕自用自己的名字出版。……由此可知，《況義》一書，至少以手鈔版本而言，好像就是金尼閣口授的著作，掩耳盜鈴……」顯見金尼閣個人作風是頗具爭議性的，然不知李之藻等人對金尼閣的看法如何，因文獻資料欠缺，故未能遽斷。

59 關於萬曆44年（1616）南京教案（亦有稱為「教難」），乃南京禮部侍郎沈潅因懼天主教於南京發展過速，而產生反教心態。故於44年5月、8月、12月分3次上疏，指陳西士傳教中土，有亂道統、謀不軌、盜神器之用意，必當驅除西士出境，以杜亂源。由於沈榷三疏參之，加以其他官員倡和先後題參，以致反教聲浪遍佈南北二京，最後神宗只得於萬曆44年12月28日降旨禁教。徐光啟7月上疏陳辯，而李之藻與楊廷筠亦出力，居其家隱為匿藏西士。參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頁201-226。

多談名理，頗似金蘭之交。[60] 至於徐光啓，則是三人之中最早結識利瑪竇者，[61] 之後又與李之藻同隨利氏學習曆算數法，[62] 故筆者認爲在這段期間三人之間應頗熟識。

不過，李之藻與楊廷筠之間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厚，則一直要到萬曆三十九年（1611）李之藻父親逝世時，楊廷筠前往杭州弔唁，始窺一二。據載楊廷筠是在杭州李之藻家結識郭居靜、金尼閣兩位傳教士，感悟之餘，請其爲之受洗。而楊廷筠眞正受洗原因，則是因爲他私下問了李之藻一個問題：「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63] 楊廷筠原篤信佛，對於天主教不容許娶妾十分不解，李之藻聽完後，嘆了一口氣，說道：「於此知泰西先生非僧徒比也。泰西誡規，天主頒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戒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不苟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64] 楊廷筠聽了這番話，始猛然驚醒，痛改前非。這是一個極具戲劇性的轉變，楊廷筠從原來的尊佛奉佛，到接受天主教義，到最後決定受洗的關鍵點，卻是因爲李之藻的一席話。以佛教術語來說，便是「當頭棒喝」。

事實上，李之藻、楊廷筠及其他士大夫在納妾問題上，都曾經歷過此種的痛苦掙扎。[65] 李之藻因較楊廷筠早幾年解決納妾問題而受洗，因而在面對楊廷筠的

60 參楊廷筠，〈同文算指通編序〉：「往予晤西泰利公京邸，與譚名理累日，頗稱金蘭。獨至幾何、圜弦諸論，便不能解。公歎曰，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參《天學初函》器編《同文算指》卷前序，明崇禎2年刊本。

61 據徐光啟《徐文定公行實》云：「庚子抵白夏，遇利子瑪竇」，按庚子即萬曆28年（1600），是年徐光啟進京赴禮部會試，路過南京，遂前往拜會利瑪竇。見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附錄，頁551。

62 據萬曆42年（1614）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觀利公與同事諸先生所言曆法諸事，即其數學精妙，比于漢唐之世，十百倍之，因而造席請益。惜余與振之出入相左，振之兩度居燕，譯得其算術如干卷，既脫稿，余始閒請而共讀之，共講之。」

63 參晉江・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轉引自（比利時）鍾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頁68。

64 同前註。

65 關於娶妾的問題，黃一農教授曾指出：「中國官紳娶妾的情形相當普遍，此一不見容於天主教的婚姻狀態，自瞿汝夔的案例開始，就不斷成為耶穌會士在上層社會傳教所面臨的重要障礙之一。從明末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韓霖，以迄清初的魏裔介、佟國器、許纘曾（徐光啟的曾外孫）等士大夫，其奉教的過程中都同樣得在『天主』與『妾』之間做一艱難的抉擇！」參《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頁77。另外，康志杰〈論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納妾婚俗的批評〉亦討論到傳教士對中國士大夫納妾的問題，表示這個問題確實嚴重干擾著當

疑惑與掙扎時，他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只不過，因爲認同利瑪竇的奉教理念，李之藻對於利子堅持的入教誡律，仍一意持守。因此，在面對楊廷筠的提問時，不僅立場堅定，同時亦直指楊氏內心不願正視的問題；然由於言辭太過犀利，若非兩人有深厚交情，其私交恐早已因此決裂。

至於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啓三人之間的私交，還可從徐光啓於萬曆四十年（1612）所寫的緊急〈家書〉內容看出：「此書萬分祕之，不可與人看一字。……賊一登岸，便可急走杭州，將家小船安頓松茅場、西溪、樓下等地方，身自入城，與郭先生、楊宗師、李我存老叔商量。」[66] 信中提醒家人避倭之事，並言若是入城，則先找郭先生（郭居靜）、楊宗師（楊廷筠）、李我存老叔（李之藻）商量。顯然，在利瑪竇逝世後，徐光啓與楊廷筠、李之藻，甚至跟傳教士郭居靜，已是患難眞情之交。

三人情誼，始自萬曆二十九、三十年（1601-1602）起，至萬曆四十年（1612）的緊急倭難、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難；其間又有修曆及購銃之大小事，使三人患難情感日趨穩固；直至天啓元年、二年（1621-1622），徐光啓還不斷寫信跟李之藻及楊廷筠談論購銃之事。[67] 其後，天啓三年（1623）時，李之藻因心灰而隱居西湖邊譯書，不再參與政事；但徐光啓始終不放棄，直至崇禎二年（1629）仍上疏論修曆之事，並召請李之藻入京修曆；惜隔年，李之藻便因病而卒。此三人之間，有將近三十年的交情，這也難怪李之藻在臨終前編印《天學初函》時，總是把另外二位摯友兼教友的譯著，或者爲其撰作序跋的書籍，列爲優先考慮編入初函的首選。

因爲楊廷筠及徐光啓的緣故，認同及參與西學的晚明文人，亦不在少數。以楊廷筠而言，他在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及第，與其同年榜上題名的另有馮應京、曹于汴等人，彼此往來相善。其中馮應京早在南京已閱過利瑪竇《交友論》、《天主實義》等書；其後結識利氏，更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爲其作〈天主實義序〉及〈刻交友論序〉；又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作〈重刻二十五

時晚明奉教人士是否可以入教的考量因素。

66 參（明）徐光啟〈家書〉，收入《徐光啟集》卷11，〈書牘二〉，頁485。

67 參（明）徐光啟，〈與李我存太僕〉書信3封及〈與楊淇園京兆〉，參《徐光啟集》卷10，〈書牘一〉，頁465-469。

言序〉；[68] 以及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作〈兩儀玄覽圖序〉。[69] 或許馮應京早與楊廷筠相識，但藉由利瑪竇的居中牽線，其與徐光啓、李之藻等人關係更進一步，則是可想而知的。

至於時任吏科給事中的曹于汴，在政治上與馮琦、葉向高、崔景榮同屬於東林黨人，與利瑪竇、楊廷筠、徐光啓不僅相善，與馮應京更爲莫逆之交，常聚共研經世實用之學。[70] 曹氏與傳教士間的往來，除了利瑪竇之外，可由其爲熊三拔口述、徐光啓筆記、李之藻訂正的《泰西水法》撰序并考訂校閱；[71] 又替龐迪我撰、楊廷筠校梓的《七克》作序；[72] 看出曹于汴透過楊廷筠、徐光啓等人，與傳教士龐迪我、熊三拔往來交遊之情況。

其他因楊廷筠而與西洋傳教士友善，並參與西學之文人，尚有熊士旂、袁升聞、許胥臣，此三人因爲楊廷筠的關係而與傳教士艾儒略相識，且爲其《西學凡》撰序并授梓；[73] 另，艾儒略按龐迪我遺稿增補的《職方外紀》，由楊廷筠彙記，在楊廷筠的邀請下，請李之藻、許胥臣、瞿式穀爲之撰序。二書均在楊廷筠及友人的推動下，於天啓三年（1623）梓印於杭州。[74] 同年，瞿式穀還至楊廷筠家，邀請艾儒略前往常熟開教。[75] 顯見楊廷筠不僅躬自奉教，同時亦擔任起傳教士與晚明文人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

68 參（明）李之藻，《天學初函》，明崇禎2年刻本。

69 據載李應試所刻地圖，乃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第4版，刻於萬曆34年北京，名為《兩儀玄覽圖》。圖分8幅，分別有馮應京、常胤緒、阮泰元、李應試、侯拱辰、利瑪竇及李應試序。其中李應試亦為受洗之奉教文人，圖序末自署為耶穌教學子，聖名葆祿。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李應試」條下，頁158-160。

70 參林東陽，〈明末西方宗教文化初傳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馮應京〉指出：「曹氏與馮應京自初會都門以後，更屬莫逆之交，共研經世實用之學。」

71 由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撰、徐光啟筆記，《泰西水法》，係於萬曆40年（1612）刊刻於北京。作序者有徐光啟、曹于汴、鄭以偉、熊三拔；而參與校閱人氏，則有安邑曹于汴、盧陵彭惟成、上海姚永濟、徐州萬崇德、瀘州張鍵、平湖劉廷元、華亭張鼐、永年李養志、華亭李凌雲、銅仁楊如皐。

72 由西班牙籍傳教士龐迪我撰、楊廷筠校梓，《七克》，係於萬曆42年（1614）刊刻於北京。作序者則有楊廷筠、鄭以偉、曹于汴、熊明遇、陳亮采、龐迪我、汪汝淳。

73 根據天啟癸亥（3年，1623）季夏之吉鄭圃居士楊廷筠，〈刻西學凡序〉云：「而其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熊子士旂、袁子升聞、許子胥臣為授梓，以廣異聞。夫此其於天學也，猶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軌，以求夙莫者也。」

74 根據天啟3年艾儒略，〈職方外紀自序〉末云：「偶從蠹簡得睹所遺舊稾，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而淇園楊公雅相孚賞，又為訂其蕪拙，梓以行焉。」

75 參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楊廷筠」條下，頁137。

至於位居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啓，其在西洋傳教士與朝廷官員、民間文人之間的交遊往來，甚至溝通與協助，更是居功厥偉。以下便從修曆及購銃之事，析述徐光啓與李之藻所結識的西學志友，並藉以瞭解這批晚明文人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的努力與期望。

（三）因修曆與購銃而結識的西學志友

明中葉以後，在西洋傳教士及晚明奉教文人的努力與奔走之下，西學的發展日趨興盛。當時許多奉教文人，不僅與傳教士之間往來密切，還利用同年、同鄉、師生以及姻親等各種關係，藉以推廣西學，欲讓更多人接受西教，以達到其實現政治理想的目的。[76] 其中，徐光啓及李之藻等人，在結識利瑪竇之後，以迄其辭世，有近三十年或超過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學習、參與，到最後認同西學及西教，期間也曾歷經多次挫敗與煎熬，但始終不放棄。這種致力於西學志業的精神，尤在曆法改革，及策劃購砲抗虜的表現上，最爲時人所稱道。

事實上，晚明有二次曆法改革的主張，第一次是發生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時，欽天監因使用大統曆觀測日食再度失準，使朝野間長期以來對舊曆失準不滿的累積，在此時達到最高峰。事實上，明代使用大統曆，乃沿自元代郭守敬創造的授時曆而來；自洪武朝開始，欽天監依據大統曆進行天象推驗即已頻見失誤，然隨著時代發展，誤差的情況越益嚴重。對此，明代歷朝官員已多次提出改曆建議，然囿限於「祖法不可變」的觀念下而多遭阻擾不行。[77] 故而到了萬曆三十九年（1611）時，欽天監五官正周子愚上疏推薦西洋傳教士參與修曆，以西曆導正舊曆之誤失，而李之藻當時亦在薦請入京修曆的名單之中。

若回溯李之藻從事曆學研究的經歷，我們會發現，從跟隨利瑪竇學習西學開始，便已開啓李之藻對西方地理、天文、算學的廣泛興趣。而他積極的研究態度，亦得到晚明朝野間許多士大夫的認同；其中，尤以徐光啓最爲欣賞李之藻。而李之藻在曆法上的表現，從他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授學政赴福建主考鄉試時，即已展現出來了。在鄉試期間，李之藻先於學子間談論曆法之學，以吸引有

76 參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

77 關於明代曆法的誤差問題，趙建海有扼要論述。參趙建海，〈李之藻和《渾蓋通憲圖說》──比較天文學的地平〉，頁203-204；另外，關於明初以來官員對欽天監驗測天象失誤的批評，在《正教奉褒》明朝「萬曆三十八」條下有詳細記錄，頁263。

志學習者；其後又利用出差之便，使用從利瑪竇處學習到的星盤原理（後來李之藻還自行仿作成「通憲平儀」），作了大量的天文觀測和計算，以證明西洋天文學的實用性。[78] 到了萬曆三十三年（1605）時，又出版了由利瑪竇口授、李之藻撰述《渾蓋通憲圖說》。而這段時間寶貴的學習經驗，除了爲李之藻日後進京修曆奠定良好的根基；同時他還說服友人鄭懷魁[79] 撰《渾蓋通憲圖說并序》，以及與徐光啓同爲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的樊良樞爲其撰寫〈鍥渾蓋通憲圖說跋〉。此種利用各種交情，或者透過不同的管道，將有志於西學的文人會聚一堂，是李之藻及徐光啓等人日後得以順利推廣西學的重要因素。

再者，傳教士利瑪竇的熱心協助，亦是促成晚明曆法改革的最大助力。由於利瑪竇體認到晚明文人對學習西方天文曆算的迫切性，因而致書羅馬耶穌會，建議派遣一批通曉天文曆法的耶穌會士來華，以協助修曆。如同利瑪竇所期望的，後來入華的耶穌會士多半具備天文曆算的紮實基礎，其才智學識亦爲當時歐洲人才中的出類拔萃者。其中，製作儀器及撰述《簡平儀說》的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以及撰述天文學理《天問略》的葡萄牙籍傳教士陽瑪諾，便是當時東來傳教的會士之一；而其與李之藻及徐光啓之間，日後亦因合譯書籍的關係而生情誼。

李之藻在曆法上的學養日趨成熟，[80] 加以徐光啓再三推薦，李之藻逐漸受到朝廷重視。除了周子愚上疏命李之藻入京協助修曆之外；另外，禮部侍郎翁正春則是附議主張讓龐迪我等人進行實際天文檢測及譯書工作。[81] 翁正春與楊廷筠爲同年進士及第，故其上疏薦請龐迪我與熊三拔與徐光啓、李之藻等人合譯曆書，[82] 想來亦是因爲與楊廷筠同年的情誼所致。而周子愚與李之藻同屬浙江人，亦同爲熊三拔《表度說》撰序，顯見兩人先是因同鄉之誼，再加上合作修曆的同僚關係，使得彼此間的情誼更加深厚。[83] 只可惜，在此次曆法改革主張提出之後，並

78 鄭懷魁，〈渾蓋通憲圖說序〉：「始李工部振之試閩癸卯（萬曆31年，1603）士，以曆志發策士，言人人殊，比振之為說天經緯，以地經緯合之，士無不人人誦服者」。

79 鄭懷魁，福建龍溪人，時任杭州處州的知州。而該年3月時，李之藻正作客於處州。

80 李之藻在萬曆36年（1608）曾任開州知州。據《開州志》，卷4，「宦蹟」記述李氏任上：「尤精曆律，吏會計錢糧，多隱匿。之藻視案牘，以西洋算法正之，眾駭服。」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頁116。

81 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卷2「禮部薦西儒修曆疏」云：「合令龐迪峨、熊三拔將大西洋曆法及度數諸書，同徐光啟等對譯成書」，頁25。

82 參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章〈「泰西儒士」與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頁123。

83 周子愚，浙江桐鄉人。值得注意是《表度說》另有卓爾康撰寫之序，而卓爾康（1570-1644）是

未得到神宗的重視，故而曆局始終不曾正式設立。

第二次提出曆法改革是在崇禎二年（1629）時，由於欽天監官員以傳統曆法推測日食再次失誤；相反地，德國籍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與義大利籍傳教士龍華民所使用的西洋曆法則是推算正確。於是禮部左侍郎徐光啓再度奏請開設曆局，以修曆法；同時委請李之藻召集鄧玉函與龍華民共同參與此事。[84] 李之藻雖以病推託，仍因摯友徐光啓請託而抱病赴京；卻在曆局召開的第二年，鄧玉函與李之藻相繼辭世，此對重新起步的修曆工作衝擊甚大。[85] 在此之前，楊廷筠亦早於李之藻辭世，三柱石之中，僅餘徐光啓一人，雖有湯若望及羅雅谷的幫助，但仍感有心無力，惜明末曆法改革最後還是無疾而終，唯幸於崇禎七年（1634）完成《崇禎曆書》。而晚明曆法改革的成效不彰，不僅阻礙中國曆法的進步，也使得西洋傳教士們欲藉西學在東方的落實與紮根，以達其推展傳教的心願，更顯微渺。

除了修曆之外，天啓年間由徐光啓等人主張購買西洋砲銃一事，亦體現出徐光啓及李之藻等人獲得許多志同道合友人對西學的友善與支援。

自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軍在薩爾滸之役慘敗後，以知兵聞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啓，一方面上疏奏請訪求南方巧匠至京仿製西洋大砲；[86] 另一方面則奉旨訓練新兵，加強防禦都城。他不但促使教友李之藻和楊廷筠積極爭取在經費上的協助，並策劃自澳門引進西洋火砲，以抵抗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而李之藻其後則安排奉教門生張燾與孫學詩赴澳門，並在耶穌會協助下，向夷商募得四門大鐵銃。[87] 在澳門購砲事件中，李之藻上疏以指陳招募夷目以訓練中國的重要性，他說：

> 此秘密神銃，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術不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憶昔瑪竇伴侶尚有陽瑪諾、畢方濟等，……大抵流寓中土，其人若在，其書必存，亦可按圖揣摩，豫資請肄。[88]

浙江仁和縣人，與李之藻同鄉，其地緣關係更是密切。

84 參郭金榮，〈耶穌會會士鄧玉函與中西文化交流〉，頁114-115。

85 鄧玉函與李之藻皆辭世於1630年，見方豪，《李之藻研究》，頁124。

86 參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

87 同上註。

88 參（明）韓霖，《守圉全書》卷3之1，《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32-3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而到了天啓元年（1621）三月，瀋陽與遼陽的相繼失陷，使得徐光啓與李之藻被委以襄理軍務和調度軍器之重責。四月間，李之藻上〈爲制勝務須西銃，乞敕速取疏〉提到：

> 昨臣在原籍時，少詹事徐光啟奉敕練軍，欲以此銃在營教練，移書托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議捐貲，遣臣門人張燾間關往購。至則塞禁方嚴，無繇得達。具呈按察司吳中偉，中偉素懷忠耿，一力擔當，轉呈制、按兩臺，撥船差官，伴送入塞。夷商聞輸感悅，捐助多金，……，此去年十月間事也。[89]

疏中提到的主要協助者吳中偉，爲浙江海鹽人，與李之藻既是同鄉，又屬同年進士，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九月任廣東按察使，後又於天啓元年（1621）二月陞廣東右布政使。在這次的購砲事件中，李之藻門生張燾央請吳中偉居中協助，顯然是經過李之藻授意，亦可知吳中偉與李之藻之間交情甚深。

再者，依照《1621年耶穌會年度報告》，除張燾被遣往澳門購砲以外，孫學詩（教名保祿）亦隨同赴澳處理此事。孫學詩，雲南楚雄人，萬曆二十二年中舉，其兄學易與楊廷筠爲同年進士。在《聖水紀言》一書中，孫學詩曾以「後學」自稱，記錄楊廷筠在杭州與人辯道的對話，書交由李之藻付梓，並替該書作序。除此之外，李之藻亦因阮泰元「素習西情」，曾建議派他到澳門雇請打造火砲的工匠二十餘人入京。[90] 顯然，這些奉教人士彼此之間若非同鄉，便是同年，甚至是師生、同學或同僚關係，以此建構起極其密切相關的人際網絡。

然則，有趣的是，許多時候，李之藻更多是透過徐光啓的關係，而認識到其他的西學志友。像是在上述購砲過程中，任廣東巡按御史的王命璿，爲福建晉江人，與徐光啓即爲萬曆三十二年同年進士；至於徐光啓的入室弟子當中，則有孫元化、韓元與韓霖皆相繼入教，同時承襲徐光啓在兵學或算學方面的衣缽；此外，像是前述提到，因瀋陽及遼陽陷落而被委以調度軍器重責的李之藻，與當時任工部的虞衡司及戶部新飼司沈棨及鹿善繼（兩人皆徐光啓門生）擔任主事而成

89 （明）韓霖，《守圉全書》，卷3之1，頁67-73。

90 阮泰元，字余吾，曾為《兩儀玄覽圖》作跋，跋文中阮泰元自題其教名為「來斯」，此應為Aloysius（或作Luigi、Louis）的音譯。參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頁75。

爲同僚關係。[91]

而在天啓元年運銃至京的過程中，十月底從廣東肇慶出發，經南雄，越大庾嶺梅關到江西，抵江西贛州時，運送隊伍受到江西巡撫韓光祐的隆重接待，韓氏是李之藻同年，且與耶穌會士相熟。後經南昌，在離開南昌數日後，還巧遇擔任湖廣按察司副使的楊廷筠。[92] 但對於在這批運送隊伍中招募夷人一事，當時的兵部尚書董漢儒並不表贊同，他認爲：「澳夷大砲，聞閩粵間有習其技者，但得數人轉相傳教，誠不必用夷人。」[93] 由於董漢儒曾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爲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撰序，可知兩人之間應頗有交情。然董漢儒最初從不主張進用夷人，到最後是在帝命的一再催促下，始修正己意，唯仍以「夷」來稱呼傳教士，顯然是代表著另外一派的反對勢力，顯見在對西方傳教士的態度上，李、董二人是對立的立場。即便如此，李之藻對西洋傳教士的協助，仍不餘遺力。

自南京教難發生後，傳教士紛遭逐入澳門，或藏匿於教徒家中。傳教士們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故而徐光啓和李之藻等人在引進西洋大砲的過程中，遂不斷強調耶穌會士擁有相關知識，甚至稱他們「皆能造作」。但教士們對兵學並不專精，此一宣傳策略曾引起教會內部不少反對聲音。李之藻嘗試說服他們：

> 苟有以軍事相委者，請勿急。當如製衣者之用針，迨線既穿過，布已成衣，針即無用。軍職之銜，不妨以針視之。但使君等能借帝命，公然入華，則此後自可放下刀劍，換上筆墨，以著述代從軍，乃可以破迷信而傳真教。[94]

可知，李之藻在經歷南京教難後，嘗試讓西洋教士東山再起，可謂費盡心思。李之藻以「穿針引線」的轉換角色來勸說傳教士先行安置，以等待時機；然若同樣以此形容詞來解釋李之藻在朝庭與傳教士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亦十分恰當。

修曆與購銃這二件事，不但使得畢方濟、龍華民與陽瑪諾等耶穌會士，分別從內地和澳門入京，不再受限於居地禁令；而鄧玉函、金尼閣、曾德昭等稍早入華的教士，也不再遮掩度日，反而昂首揚眉。若說西洋曆法及大砲的引進，提供

91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

92 參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頁77-78。轉引自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

93 黃一農，同上註。

94 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轉引自黃一農，同上註。

了傳教士一個突破中國禁教困境的最佳機會，倒不如說是因爲晚明這批奉教文人的努力，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因爲西方文化的出現而產生新的刺激與改變；而透過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會與激盪，無形中提供了傳教士們欲藉西學以傳教的出路與期盼。

三、《天學初函》的構成與選書

明崇禎二年刻印的《天學初函》，乃李之藻畢其後半生心力編纂而成，被視爲是中國第一部以天主教爲主的西學叢書彙編。是書定爲「初函」，或有擬續刻二函、三函之構想，然書成後隔一年，李之藻便因病逝世，而未及續編。[95] 據此，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序云：「其曰初函，蓋尚有唐釋多部，散在釋氏藏中者，未及檢入。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奇探賾，尚有待云。」[96] 從文中看出，李之藻編爲初函，除了仍有多部未及檢入的釋藏圖書外；另有方在候旨的西書七千卷（或有言冊）待譯。言下之意，李之藻從構思編纂到眞正成書梓印期間，並未擇取上述多部釋藏圖書及金尼閣攜來的七千部西書入編，[97] 或許是因爲某些主客觀因素，使得李之藻最後僅列二十種圖書纂成「初函」，此必有其考量。以下便針對李之藻《天學初函》的編排及內容，釐析其擇取選書最有可能的考量因素。

（一）《天學初函》的內容及編排

李之藻編纂《天學初函》的契機、構思及編排，在書前序文中已有清楚的概述：

> 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顯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玄，得未曾有。顧其書散在四方，願學者每以不能盡覩為憾。茲為叢諸舊刻，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同志，略見九鼎一臠。[98]

95 參陳垣，〈浙西李之藻傳〉云：「之藻未卒之前年，尚刻《天學初函》二十種，曰：『初函』者，擬續刻也。」見《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頁78。

96 參（明）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天學初函》卷前序，明崇禎2年刻本。

97 參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方豪六十自定稿》。

98 同註96。

根據此段敘述，李之藻因利瑪竇而接觸天主教義及西方學術，因覺言近旨深，卻少人知，即有閱過者，然書亦零散四方，無法盡睹。爲使有志學者能盡覽其書，遂興起彙編構想，將所蒐西書性質按照傳統「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99]的道、器觀念，分成二編：凡關乎教義、哲理、理念等形而上的思想者，歸於理編；而將天文、數理、曆算、水利等具有俾利民生實用的形而下技術，歸入器編。

爲了更清楚《天學初函》的擇書與編排，以下根據李之藻臚列的理編與器編內容，分別析述：

1.理編

《天學初函》理編所列西書，計有《西學凡》、《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畸人十篇》、《交友論》、《二十五言》、《天主實義》、《辯學遺牘》、《七克》、《靈言蠡勺》、《職方外紀》十種，羅列於下：[100]

表一：理編十種概述表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單行本刊刻時間	單行本刻書地	內容概述
理編1	西學凡一卷	(明)義大利人艾儒略撰	許胥臣 楊廷筠 熊士旂	1623	杭州	此為西學概要之書，根據耶穌會於1599年制定《教學章程》而來。分西學為六科，依次為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是介紹西方教育課程之專著。
理編2	唐景教碑附一卷	(唐)大秦寺僧景淨撰	李之藻	1623	西安出土	又名〈景教流行中國寶頌〉，唐建中二年（781）立於長安義甯坊大秦寺，被視為景教徒傳入中國之最早文獻。

99 語出《周易》卷7〈繫辭上〉，頁47。

100 據方豪《李之藻研究》云《天學初函》版本有9種之多，而後余施霖《李之藻《天學初函》之研究》又以方豪所述為研究基礎，按《天學初函》藏地，統計出12種版本。而本文所採用的藏本，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崇禎2年刻本。此外，此表為筆者按方豪、余施霖等列述《天學初函》內容，彙集整理而成，唯單行本刊刻時間及地點，係指早於李之藻在崇禎2年（1629）刻《天學初函》之前便已刊行或流通的本子而言。

（續表一）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單行本刊刻時間	單行本刻書地	內容概述
理編3	畸人十篇二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撰／汪汝淳校梓	李之藻 周炳謨 王家植	1608 1609	北京 南昌	以問答體記錄利氏與當時文人探討生死吉凶諸事，并闡述教義。末附利瑪竇因獻神宗西洋樂器雅琴一具，故譯樂曲〈西琴曲意〉八章併之。
理編4	交友論一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撰	馮應京 瞿汝夔	1595 1599	南昌 南京	此乃利瑪竇赴見建安王時，因席中論及交友之道，故將所聞格言或自身體會撰述成書。是書采錄西方哲人的交友格言，并參酌《論語》等古代著述編輯而成的格言集。
理編5	二十五言一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撰／汪汝淳校梓	馮應京 徐光啟	1604	北京	此為利氏編譯之倫理箴言集，共列二十五則短論。萬曆年間時，湖廣按察使司僉事馮應京於獄中讀到此書，其後不僅為其作序，將此書與佛教《四十二章經》互為比較，更深受影響，欲因而皈依天主。
理編6	天主實義二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撰	李之藻 馮應京 利瑪竇 汪汝淳	1595 1603 1605 1607	南昌 北京 杭州 杭州	又名《天學實義》，採晚明講學盛行的語錄體，以自問自答形式，解答儒者對天主教理的種種疑惑。
理編7	辯學遺牘一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撰	涼庵居士（李之藻）	1609	北京	是書遺牘有三，分別是〈虞德園詮部與利西泰先生書〉、〈利先生復虞詮部書〉、〈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為利氏與虞淳熙、蓮池大師袾宏書信往返之作。
理編8	七克七卷	(明)西班牙人龐迪我撰／楊廷筠校梓	楊廷筠 鄭以偉 曹于汴 熊明遇 陳亮采 龐迪我 汪汝淳	1614	北京	龐迪我針對天主所禁七罪，包括驕傲、嫉妒、慳吝、忿怒、迷飲食、迷色、懈惰於善，主張以七德克之，分別為謙讓、仁愛、舍財、容忍、淡泊、絕欲、勤於天主之事，為勸善之書。此書意旨多受士人讚揚。
理編9	靈言蠡勺二卷	(明)義大利人畢方濟口授／徐光啟筆錄	畢方濟	1624	上海或嘉定	此為論述靈魂之書，分別以亞尼瑪（靈魂，ANM）之體、能、尊，以及最終所向，闡述靈魂與肉體的關係、靈魂本質，及靈魂的各種功能，最終歸向於至美好的天主。

（續表一）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單行本刊刻時間	單行本刻書地	內容概述
理編10	職方外紀五卷 卷首一卷	(明)義大利人艾儒略增譯／楊廷筠彙記	李之藻 楊廷筠 瞿式穀 許胥臣 艾儒略	1623	杭州	是書為艾儒略根據龐迪我、熊三拔底本增譯而成，內容囊括西班牙及美洲的地理知識；另加上他自己手輯的方域梗概，及耶穌會士在世界各地親歷見聞，包括印度及中亞地區等等。

2.器編

《天學初函》器編所列西書，分別爲《泰西水法》、《渾蓋通憲圖說》、《幾何原本》、《表度說》、《天問略》、《簡平儀說》、《同文算指》、《圜容較義》、《測量法義》、《句股義》十種。

表二：器編十種概述表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刻書時間	刻書地點	內容概述
器編1	泰西水法六卷	(明)義大利人熊三拔撰／徐光啟筆記	徐光啟 曹于汴 鄭以偉 熊三拔	1612	北京	是書為介紹西方汲水器具、取水蓄水，以及運用水力之法，為重要的水利專書。書分六卷，前五卷言龍尾車、玉衡車、恒升車等水器之製作、組成及使用之法，另有水庫、鑿井、水性等論述；最末卷為水器圖譜。
器編2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 卷首一卷	(明)李之藻撰	李之藻 樊良樞 鄭懷魁	1607	北京	此書為翻譯自利瑪竇恩師丁神父所著的「Astrolabium」節譯本，由利瑪竇口授，李之藻再加以整理撰寫。是書出於西洋簡平儀法之說，卷上言渾象圖說、赤道規界說、黃道規界說等，並繪渾象圖等多幅天文繪圖；卷下則有經星位置圖說、歲周對度圖說等章節。
器編3	幾何原本六卷	(希臘)歐幾里得著／(明)義大利人利瑪竇譯／徐光	徐光啟(序跋三則) 利瑪竇	1607	北京	《幾何原本》原有十三卷，包括131個定義、5個公設、5個公理，以及465個命題。徐光啟隨利瑪竇僅譯了前六卷；後九卷則是直到1857年才
				1611	北京	

（續表二）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刻書時間	刻書地點	內容概述
		啟筆受				由數學家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 Wylie)翻譯完成。前六卷主要論述三角形、圓形、多邊形等平面幾何概念。本書影響甚遠，到清康熙年間還有滿文譯本。
器編4	表度說一卷	(明)義大利人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爾康記	熊明遇周子愚李之藻	1614	北京	是書以例題圖說講述日輪周行之理、日輪大於地球之比例，以及立表取影之原理用法，其目的在於獲知時刻、節氣之推算，並認為須明天地之運行，習於三角之算術，方可達至準確。
器編5	天問略一卷	(明)葡萄牙人陽瑪諾撰／周希令、孔貞時、王應熊協助	周希令孔貞時王應熊陽瑪諾	1615	北京	全書以問答形式寫成，共分四篇。第一篇介紹十二重天球體系；第二篇說明太陽運行及日距赤道度分、日食等天文現象；第三篇說明晝夜長短隨季節和地理緯度的不同而變化，以及東西時差與經度的關係；第四篇為月球運行及月食現象。是書圖說兼備，指證詳明，與熊三拔的《表度說》次第相承，可互為參照。
器編6	簡平儀說一卷	(明)義大利人熊三拔撰／徐光啟記	徐光啟	1611	北京	是書為用以觀測太陽之簡平儀工具書。首列名數十二則，介紹此儀器的結構及製作原理；次為用法十三則，說明測量的方法及用途。此儀器用上、下兩盤，天盤在下，所以取赤道經緯；地盤在上，所以取地平經緯。以此儀器可作日晷、方位角定位之測量，亦有利於航海之用。
器編7	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授／李之藻演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	1614	杭州	本書為介紹歐洲筆算的第一本數學著作。根據書前李之藻序，原分三編，〈前編〉為舉要，介紹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通編〉演其例，講述分數比例、方程式、開方等算法；〈別編〉則未刊刻，故今不存。
器編8	圜容較義一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口授	李之藻	1608	北京	是書先言圜（圓）容之義，說明最多邊及最等邊的形狀都是圓形；次

（續表二）

類別	書名	撰編譯校人	序跋人	刻書時間	刻書地點	內容概述
		／李之藻演		1614	杭州	言「立五界說及諸形十八題」，列出18題關於三角形、圓形、球形等計算該平面或立體體積的數例。
器編9	測量法義一卷附測量異同一卷	(明)義大利人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受	徐光啟	1608(一說1617)	北京	是書為引用《幾何原本》的公理理論，以測量地表面積的數學計算集。首先介紹矩度（應用於直角相似三角形）；次論景（直影、倒影的原理與運用）；再以15題數例講述高、廣、深、遠的測量方法。末附《測量異同》一卷，則是徐光啟利用6題數學演算，試圖比較中西算學方式的不同。
器編10	句股義一卷	(明)徐光啟撰	徐光啟	1608(一說1617)	北京	是書為徐光啟利用西方數學理論來解釋中國傳統句股測量法，藉以會通中西數理。先由門人孫元化歸納傳統算法15條，再由徐氏以西學理論釋其義。

根據上述列表，若按圖書性質分類來看，便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理編的選書，包括了探討生命各種觀點的問答集《畸人十篇》，以及論述交友、爲人處世觀念的《交友論》、《二十五言》，其皆由利瑪竇撰述。書中多是闡述體會生命與生活實踐的哲理或思維，而此種觀點不單得到晚明文人的認同，同時亦爲其帶來思想上的新啓發，故書甫一出版，便廣受時人歡迎，一再刷印；至於利瑪竇撰《天主實義》、《辯學遺牘》，龐迪我撰《七克》，畢方濟撰《靈言蠡勺》，其性質雖有不同，然旨要皆與天主教義相關，或爲教義的辯駁澄清，或敘明教義規範，或言靈魂本質等等；至於艾儒略撰《西學凡》，雖是講述西方教育課程，然亦言及教育理念，若歸於理編範圍，則無不妥。

然而特別值得提出討論的，便是在西安出土的唐代《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與艾儒略撰《職方外紀》。《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爲唐代大秦寺僧景淨撰，於唐建中二年（781）由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嚴書寫，碑立於長安義寧坊的大秦寺。李之藻之所以看到此碑文，乃由於歧陽張賡虞寄來的碑文，引起李之藻的

極大興趣，關於這段記載，見於天啓五年（1625）自撰〈讀景教碑書後〉：

> 廬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西泰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先無元，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眾聖元，尊真主。[101]

顯然李之藻讀完此景教碑，在與傳教士們互相討論後，[102] 更加確定了早在唐朝已有景教入華之事，無疑地爲利瑪竇等人來華傳教確立其正當性與可信度。李之藻其後又說道：「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士紳見習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相參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帝天之景命。」[103] 碑文本身雖非闡述天主教義，卻可證明天主教早已入華的事實，甚至有唐人信教之事實。此對於傳教士及教徒而言，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性意義。故而，李之藻將其置於理編，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艾儒略撰《職方外紀》，在四部類目中屬於史部地理類，[104] 卻被李之藻歸入理編，則令人疑惑。關於此點，歷來研究者多論以書中地理學的觀點，[105] 卻未曾言及此書置於理編之因，而李之藻在序文中亦未明白提及。倒是筆者據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所云：

> 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處而爭名競利於蠻觸之角也與哉，則性為形役，實錯厥履。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自錮，而孰知耳目思想以外，有如此殊方異俗、地靈物產，真實不虛者。此見人識有限，而造物者之無盡藏也。[106]

推測李之藻選擇《職方外紀》入《天學初函》，固然是淵源於個人志趣偏好地理圖學的緣故；然而透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對於地理學的認識，已

101 參（明）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天學初函》，明崇禎2年刻本。

102 當時李之藻討論的對象，必然有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與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的陽瑪諾。參計翔翔，〈明末奉教官員李之藻對景教碑的研究〉。

103 同前註101。

104 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職方外紀》被置於史部．地理類下。

105 像是霍有光，〈《職方外紀》的地理學地位及當時地理知識的中西對比〉，以及許序雅、陳向華〈《海國圖志》與《職方外紀》關係考述〉，皆是以地理學的角度探討此書所載五大洲之地理知識及傳承影響。

106 參（明）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天學初函》，明崇禎2年刻本。

不單單侷限在地圖學的範疇，而是對於整個宇宙無限永恆觀點的認知，以及對造物者的無盡讚嘆。這種觀點改變了以往他對宇宙天體與世界地理的概念，雖此書所言主要爲五大洲的山川、海洋等地理知識；然書中提及的不僅如此，涉及範疇還包括人文方面的風土民情、物產鳥獸等事物。

對於李之藻而言，艾儒略《職方外紀》書中內容所述除了地理知識之外，則還包括了對於天道人事的體認，故而說出：「庶吾儕未闡天道，先語地圓，不詒先後倒置之訛也乎。」[107] 換言之，《職方外紀》在艾儒略及楊廷筠的譯寫之下，已不單單只是一部闡述地理知識的圖書而已，而是向上延伸至天道的概念層次，影響所及，甚至當李之藻在編書分類時，也認同此種觀點，故而將其編入《天學初函》的理編，自有其考量的立基。

（二）李之藻選書的取與捨

至於當初李之藻決定選擇那些書籍先行編入初函，則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前述文中曾提及李之藻與傳教士及晚明友人之間的交遊程度，對日後在思考選入「初函」書籍的優先順序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此節另以「初函」所選各書之撰述者及序跋者爲分析對象，探討李之藻選書時的取與捨。

《天學初函》理篇與器篇計收二十種書籍，根據各書撰述及序跋者列表，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利瑪竇《交友論》撰述及梓印的時間太早（第一版印於1595年），以致當時李之藻等三人還來不及認識利子，故未爲之作序之外；其餘各書皆有李之藻、徐光啓、楊廷筠其中一人參與譯述，或爲之序跋的情形出現。

再者，在眾多傳教士著述之中，以利瑪竇親爲撰述六部，加上口授四部，總計十部，數量最多；次爲熊三拔參與的三部；再者爲艾儒略、龐迪我參與的二部；以及陽瑪諾、畢方濟的各一部，總計有十七部，皆係傳教士與晚明文人合譯編寫之書。有趣的是，在李之藻蒐書編入《天學初函》的過程中，其考量因素或許很多，然筆者認爲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跟他在人際交遊的層面上有關。利瑪竇與李之藻的深厚情誼，前已述及，此處已不需再贅述。至於熊三拔與徐光啓及李之藻，則是因爲修曆緣故，而建立深厚的交情；其中尤以徐光啓與熊三拔往來最爲密切，這是因爲兩人在合作譯述《簡平儀說》之後，又合譯了《泰西水法》，

107 同前註。

已有合作默契。而艾儒略則與楊廷筠、李之藻的關係則較爲親近，艾儒略曾爲楊廷筠撰寫《楊淇園行略》；[108] 而泰昌元年（1620）時，李之藻丁內艱，艾儒略又親至杭州爲李之藻料理其母後事，可見此三人交誼之深；另，陳儀爲艾儒略《性學觕述》撰序中提到艾儒略時，則是清楚說出：「京兆淇園楊公、太僕我存李公尤相篤慕。」[109] 顯然這幾位傳教士與李之藻的淵源要較其他傳教士來得深厚許多。

至於龐迪我與李之藻，或是陽瑪諾與李之藻之間，則比較像是間接關係，尤以陽瑪諾撰寫《天問略》一書，其爲天文之學，與熊三拔《表度說》次第相承，因其具互爲參照之功效，故而被收入「初函」之中。但事實上，李之藻與陽瑪諾兩人之間並無特別密切往來，推測可能因爲此書既言天體之學，與熊三拔著書又有參照功用，十分符合李之藻等人致力修曆的實質需求有關。

故而，若論及李之藻選書入「初函」的優先順序，筆者認爲應該有以下幾個考量點：

（一）按照書籍性質分類，以符合「理編」及「器編」的分類項下，優先列入考量。理編以闡述形而上的思想或教義爲主，像是教育理念、德性思想、天主教義等等；至於器編所選的書籍，則多偏向天文曆算、數理演算等方面，此或與徐光啓等人重視修曆、購銃等利國民生這類實用之學有關。

（二）編入《天學初函》的單行本，其成書或刊行時間，以不晚於天啓年間爲考量重點。從上述表一及表二所列單行本刊行時間推測得知，其蒐書之中較晚刊行的書籍爲天啓三年（1623）及四年（1624）左右的本子，包括天啓三年的艾儒略《西學凡》、《職方外紀》，以及西安出土《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天啓四年則有畢方濟《靈言蠡勺》，其後雖亦有不少關於教義及科技方面的西書陸續被譯出，但並未被李之藻收入「初函」之中。由於李之藻在編書時，除了以理、器分編之外，其在選擇書籍時，仍是經過愼重考慮，之所以未收天啓四年以後的西書，料想此時的李之藻已胸有丘壑，對於「初函」所收書籍早有定論，只是因故遲至崇禎二年（1629）始刊刻印行，然卻因隔年辭世，而留下未竟之業。

（三）以恩師利瑪竇撰述、口授的西學書籍爲優先考量；次爲李之藻自己，

108 是書梓印於明崇禎元年（1628），見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40。
109 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冊，頁196。

表三：天學初函各書撰述及序跋人表

書名／人名	利瑪竇	艾儒略	龐迪我	熊三拔	畢方濟	陽瑪諾	李之藻	徐光啟	楊廷筠
西學凡		**撰述**							序刻西學凡序
唐景教碑							跋讀景教碑書後		
畸人十篇	**撰述**						序刻畸人十篇		
交友論	**撰述**								
二十五言	**撰述**							跋跋二十五言	
天主實義	**撰述** 序天主實義引						序天主實義重刻序		
辯學遺牘	撰述								
七克			**撰述** 序七克自序						**校梓** 序七克序
靈言蠡勺					**口授** 序靈言蠡勺引			**筆錄**	
職方外紀		**增譯** 序職方外紀自序	**撰稿**				序刻職方外紀序		**彙記** 序職方外紀序
泰西水法				**撰述** 序水法本論			**訂正**	**筆記** 序泰西水法序	
渾蓋通憲圖說	**口授**						**撰述** 序渾蓋通憲圖說自序		
幾何原本	**譯著** 序譯幾何原本引							**筆受** 序刻幾何原本序、幾何原本	

（續表三）

書名／人名	利瑪竇	艾儒略	龐迪我	熊三拔	畢方濟	陽瑪諾	李之藻	徐光啟	楊廷筠
								雜議、題幾何原本再校本	
表度說				**口授**			序表度說序		
天問略						**撰述** 序天問略自序			
簡平儀說				**撰述**				**筆記** 序簡平儀說序	
同文算指	**口授**						**演算** 序同文算指序	序刻同文算指序	序同文算指通編序
圜容較義	**口授**						**演算** 序圜容較義序		
測量法義	**口授**							**筆受** 序題測量法義	
句股義								**撰述** 序句股義序	

或摯友兼教友楊廷筠、徐光啓與其他傳教士合譯編寫之著述爲主；最後若有楊廷筠、徐光啓等友人序跋推薦或稱譽的書籍，亦列入考量。其餘關係不深的傳教士著述，則罕少列入李之藻的「初函」首選。

結　語

從李之藻於萬曆、天啓年間著手編纂《天學初函》，到崇禎二年（1629）梓印出版之期間，正是晚明政治動盪不安、黨派傾軋之際。此時，以利瑪竇爲主的一批傳教士先後入華，雖爲傳教，同時卻也帶來西方的教義思想及科技學術；而

在透過傳教士與晚明奉教人士的積極譯著與廣爲流傳之後，這股西方思潮始被引爆出來，形成明末最具力量的一股文化衝擊。李之藻《天學初函》的編纂，正是這股東西文化衝擊下交會激盪的成果。

然而，誠如李之藻定此書名爲「初函」，其擬欲續刻二函、三函的想法，自然不言可喻。惜初函書成之後，隔年李之藻便因病而卒，續刻之事遂成絕響。即使如此，在晚明文人的眼中，李之藻《天學初函》的纂輯成書，仍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注意，據陳援庵的說法：「《天學初函》在明季流傳極廣，翻板者數次，故守山閣諸家均獲見之。」[110] 然則，明季藏書家雖多蒐此部各書，惜少有整部完整的《天學初函》，[111] 歸納原因，或與晚明文人對於西學書籍接受度不高；或仍以有俾民生實用之西學書籍爲重，故而蒐書零散；或與李之藻成書過晚，而又逝世過早，以致人亡，書亦隨之散佚。

然不論如何，在明末西學東漸的歷程中，《天學初函》的纂輯成書，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之間的重要成就，亦是一個新的開端；而隨著明亡清興的朝代更迭，以及李之藻的逝世，使得其欲續刻《天學初函》的想法，反倒成了未竟之尾聲。若使二函、三函，得以續編，並廣爲流傳，其對於晚明中西文化交流之助益，恐不僅如此，思及此，則不免令人感到無限欷噓。

110 參陳垣，〈靈言蠡勺重刊序〉，《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

111 參鍾鳴旦、杜鼎克著，尚揚譯〈簡論明末清初耶穌會著作在中國的流傳〉，頁60-62。該文將耶穌會士漢文著譯分錄目錄編成表格，列出明清各藏書家書目中著錄的西學圖書。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魏）王弼、韓康伯注《周易》，《四部叢刊．初編．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明）艾儒略，《職方外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李之藻，《天學初函》，明崇禎2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明萬曆間婺源知縣馮時來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李光元，《市南子》，明崇禎間鍾陵李氏家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徐光啓，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

（明）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卷493《李我存集》，《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2-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陳邦瞻，《陳氏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明萬曆戊午(46年)滏陽郡守牛氏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錢文薦，《麗矚樓集》，明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明）韓霖，《守圉全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32-3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阮元，《疇人傳》，清光緒丙申(23年，1896)上海璣衡堂石印本，國家圖書館藏。

（清）羅復晉修，《撫州府志》，清雍正7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de Semedo, Alvaro（曾德昭）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Dehergne, Joseph S.J.（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Etiemble, Rene（安田樸）、Jacques Gernet（謝和耐）等著，耿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

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

Ricci, Matteo（利瑪竇）、Trigault, Nicolas（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Standaert, Nicolas（鍾鳴旦）、Ad Dudink（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Standaert, Nicolas（鍾鳴旦）、Ad Dudink（杜鼎克）著，尚揚譯〈簡論明末清初耶穌會著作在中國的流傳〉，《史林》，1999年第2期，頁58-62。

Standaert, Nicolas（鍾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Witek, John W. S. J.（魏若望）著，吳莉葦譯，《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39-5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香港公教眞理學會出版，1970。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毛瑞方，〈明清之際七千部西書入華及其影響〉，《文史雜志》，2006年第3期，頁4-7。

王俊才，〈論利瑪竇等傳教士的知識傳教及其西學帶來的影響〉，《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卷1期，2006年1月，頁141-147。

王煌文，《方以智的家學與際遇對其西學之影響》，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

王韜，《近代譯書目．泰西著述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江曉原，〈《崇禎歷書》的前前後後(下)〉，《文化廣角》，1997第2期，頁112-116。

余施霖，《李之藻《天學初函》之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冷東，《葉向高與明末政壇》，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李小林，〈吳道南及其《國史河渠志》〉，《史學集刊》，1998年第3期，頁26-33。

李天綱編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香港：道風

書社，2007。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北京：商務印刷館，2001。

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周建平、葉新建，〈論羅洪先《廣輿圖》對朱思本《輿地圖》的繼承與發展〉，《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0卷第1期，1999年3月，頁72-76。

周康燮主編，《利瑪竇研究論集》，臺北：崇文書局，1971。

林東陽，〈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收入《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1983，頁313-336。

林東陽，〈明末西方宗教文化初傳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馮應京〉，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211-257。

武斌，《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姜道章，〈論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徵〉，《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7卷第3期，1988年，頁262-272。

洪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3、4合期，頁1-50。

計文德，《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的西學》，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計翔翔，〈明末奉教官員李之藻對景教碑的研究〉，《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頁130-136。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6。

祝平一，〈跨文化知識傳播的個案研究——明末清初關於地圓說的爭議，1600-180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3分，1998年9月，頁589-670。

康志杰，〈論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納妾婚俗的批評〉，（《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頁136-143。

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臺南：聞道出版社，1983。

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收入《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2冊「中西文化交流」，1956，頁201-226。

張錯，《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2。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許序雅、陳向華，〈《海國圖志》與《職方外紀》關係考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

版》，2004年第7期，頁65-69。

郭金榮，〈耶穌會會士鄧玉函與中西文化交流〉，《同濟大學學報》，第13卷第3期，2002年6月，頁113-117。

陳垣，〈浙西李之藻傳〉，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71-79。

陳開華，〈《天學初函》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義〉，《中國天主教》，1999年第4期，頁40-44。

嵇立群、芮信，《中國文化雜說(十) 中外交流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第7卷第1期，1996年3月，頁137-168。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3期，2004年9月，頁573-634。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大出版社，2005。

趙建海，〈李之藻與《渾蓋通憲圖說》－比較天文學的地平〉，《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第2期，頁196-210。

霍有光，〈《職方外紀》的地理學地位及當時地理知識的中西對比〉，《中國科技史料》，第17卷第1期，1996，頁16-25。

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羅冬陽，〈論明末清初西學的分期與特徵〉，《東北師大學報》，2002年第4期，頁28-35。

羅光，《利瑪竇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An Unfulfilled Voice for Western Studies in Late Ming China: Li Chih-tsao and His *T'ian- hsüeh Ch'u-han*

Hsu Yuan Ting
Department of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 group of Jesuit missionaries including Matteo Ricci entered China, influencing the Emperor, ministers, and scholars with new Western learning. At that time, many high level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these Western disciplines with Ricci. One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Catholicism", Li Chih-tsao studied closely with Ricci, and through careful study became an important Catholic convert and writer.

In addition to his diligent studies, Li Chih-tsao was also an enthusiastic publisher. His *T'ian-hsüeh Ch'u-han*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iest extant Chinese compi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his book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Wan-li and Ch'ung-chen reigns, and principally contains the Western works translated by Father Ricci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literati. These works include religious philosophy, astronomy, horology, irrigation, and other scientific works; it is an important volum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als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text of this volume, the spread of different editions, the individual books translated for inclusion, and Li Chih-tsao's attitude towards compiling the *T'ian-hsüeh Ch'u-han.*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describe literary compilations of the late Ming, gazettes and memorials, as well as summarize modern research on these works. Further, it will trace Li Chih-tsao's individual academic development, his social network, and how all of these influences came to bear on his compilation of the *T'ian-hsüeh Ch'u-han.*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considered by top-level scholars to be a cultural challenge. They were forced to confront this challenge and adapt, effectively deci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would accept this influence.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was a time of complex political chan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Using the *T'ian-hsüeh Ch'u-han*,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amine the confrontation in culture and science rippling through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Daniel Greenberg)

Keywords: Ming dynasty, *T'ian- hsüeh Ch'u-han,* Li Chih-tsao, Western missionaries, scholarly associ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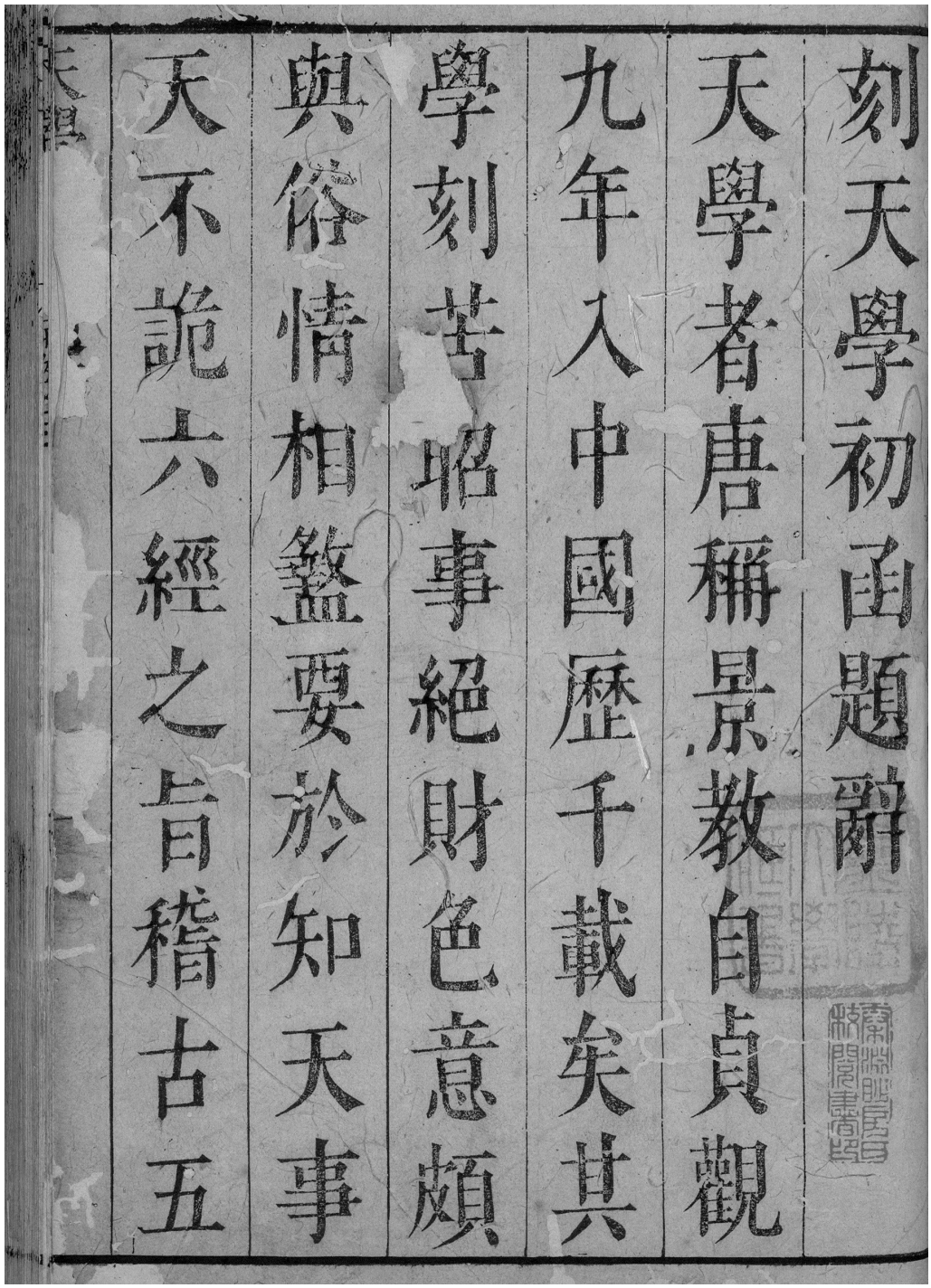

刻天學初函題辭
天學者唐稱景教自貞觀
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
學刻苦昭事絕財色意頗
與俗情相盭要於知天事
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

圖1　李之藻題〈刻天學初函題辭〉　明崇禎二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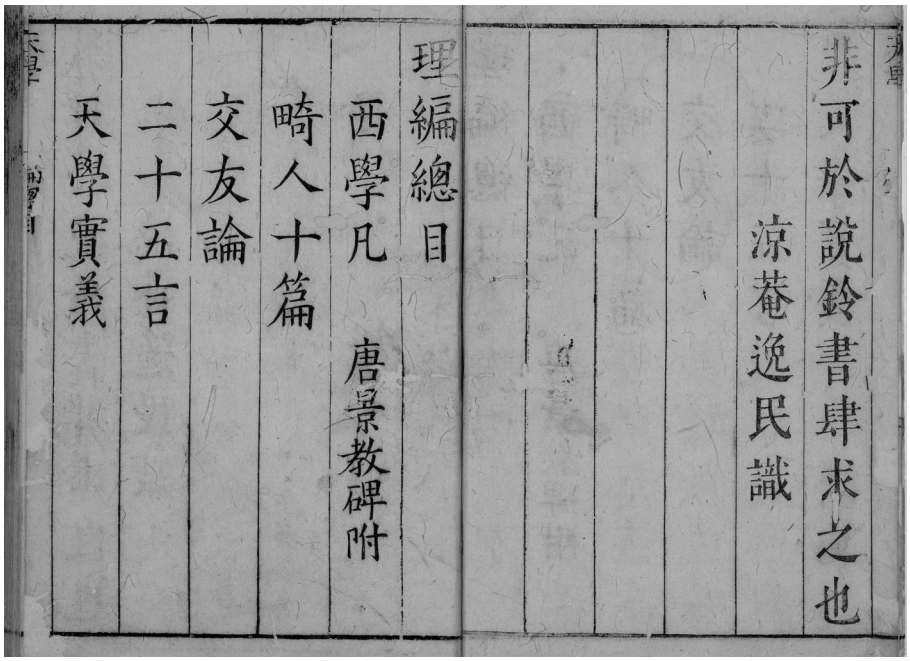

非可於說鈴書肆求之也
涼菴逸民識
理編總目
西學凡 唐景教碑附
畸人十篇
交友論
二十五言
天學實義

圖2 《天學初函》理編十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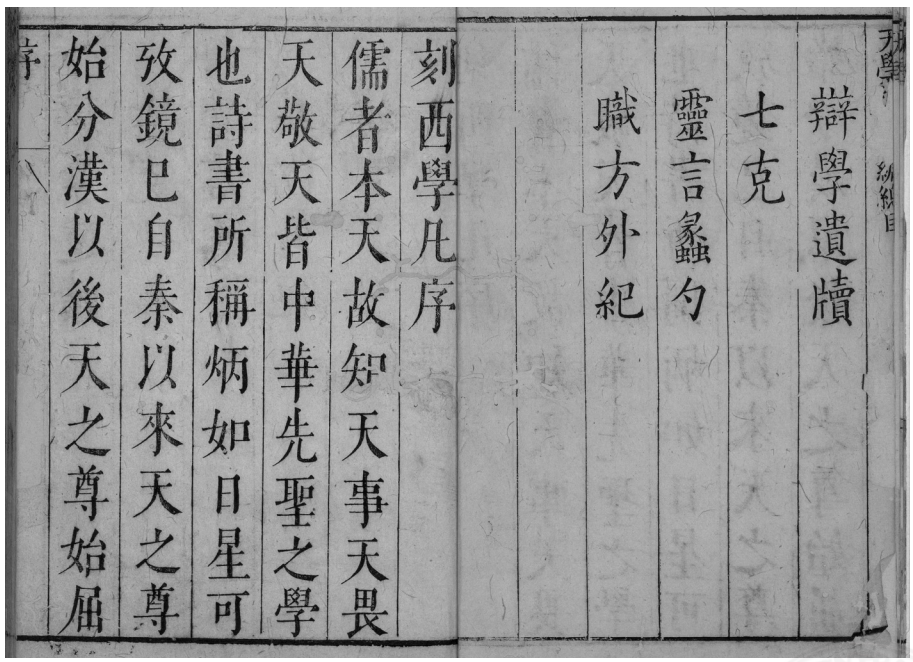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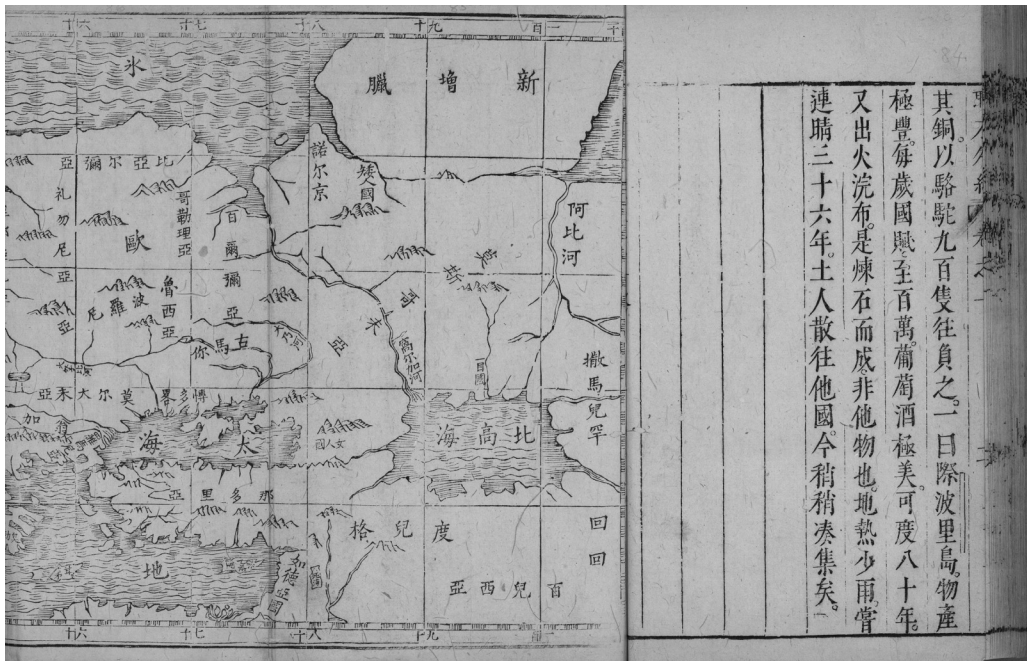

辯學遺牘
七克
靈言蠡勺
職方外紀
刻西學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
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
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
攷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
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

圖3 《天學初函》首部《西學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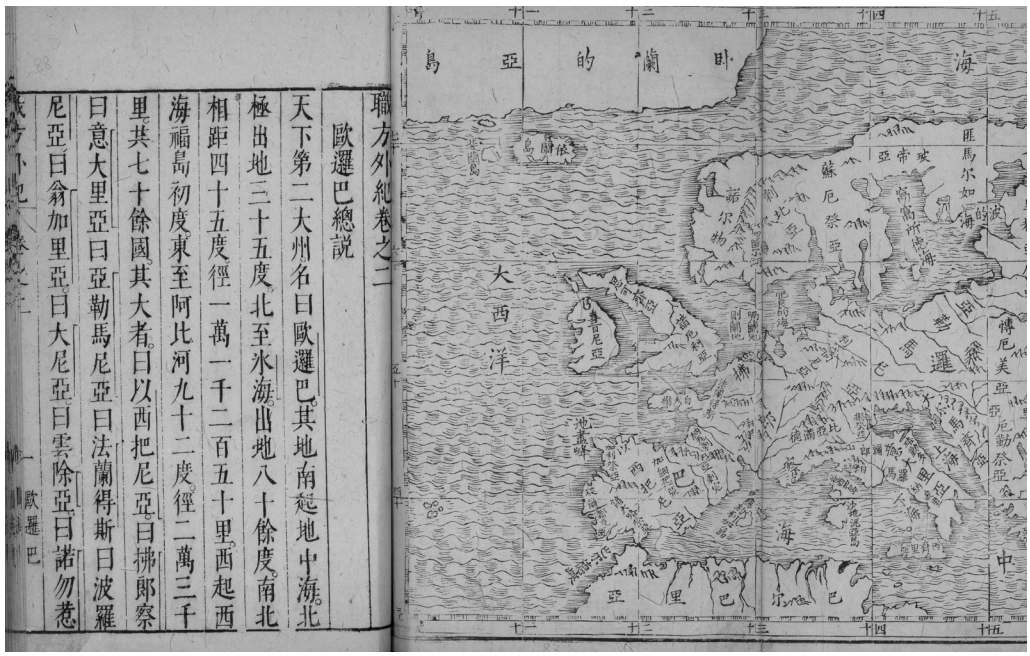


圖4,5 《職方外紀》由義大利籍傳教士艾儒略增譯、楊廷筠彙記 收錄於《天學初函》理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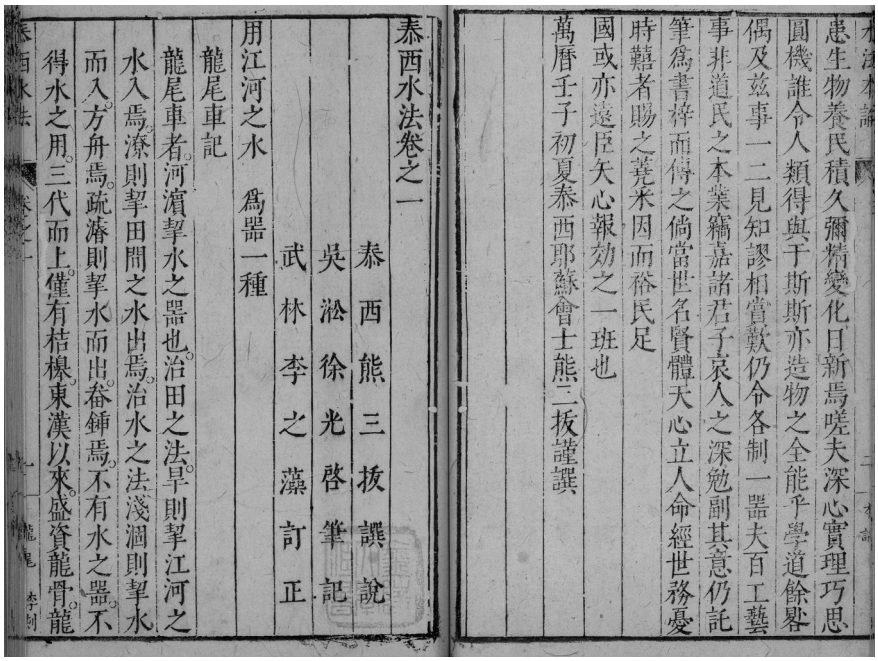

泰西水法卷之一
泰西熊三拔譔說
吳淞徐光啓筆記
武林李之藻訂正
用江河之水 爲器一種
龍尾車記
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治田之法旱則挈江河之水入焉潦則挈田間之水出焉治水之法淺涸則挈水而入方舟焉疏瀹則挈水而出畚鍤焉不有水之器不得水之用三代而上僅有桔槔東漢以來盛資龍骨龍
愚生物養民積久彌精變化日新焉嗟夫深心實理巧思圓機誰令人類得與于斯斯亦造物之全能乎學道餘晷偶及茲事一二見知謬相嘗歎仍令各制一器夫百工藝事非道民之本業竊嘉諸君子哀人之深勉副其意仍託筆爲書裨而傳之倘當世名賢體天心立人命經世務憂時藉者賜之莞米因而裕民足
國或亦遠臣矢心報効之一班也
萬曆壬子初夏泰西耶穌會士熊三拔謹譔

圖6 《泰西水法》 由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口述、徐光啟筆記、李之藻訂正收錄於《天學初函》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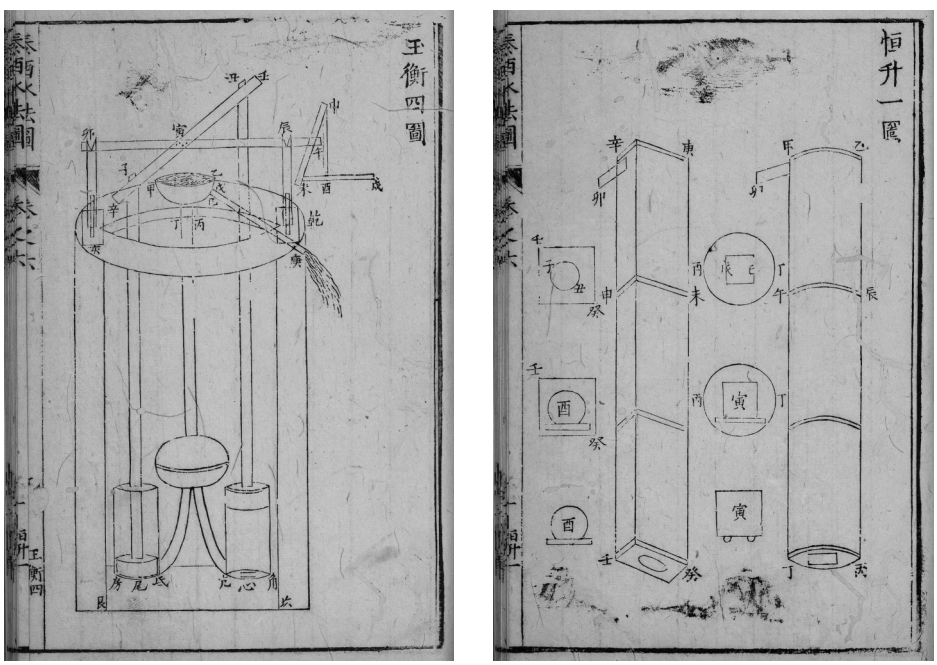


圖7, 8 《泰西水法》玉衡車、恒升車繪圖 兩者皆為井泉挈水之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